

## 中研院史語所藏王念孫論經義函手稿 之再議及研探

蔡根祥\*

### 一、前言

清朝在乾隆、嘉慶兩朝，迄於道光中葉之間，百有餘年，經史考證之風大行，樸學大師繼興，在學術史上，所謂「乾嘉學派」，於焉形成。其流風所及，歷久而不衰。至於今日二十一世紀伊始，其影響力依然存在。尤其是近百年大陸地區出土地下文物甚夥，其研究探求之法，實與乾嘉學術觀念與方法，並無大異。

清朝初期，黃宗羲（1610-1695）可以視為宋明學術史之總結，至此宋明理學無甚發展空間，唯在朱、陸之間進退，並在陽明學術路向之修正而已。與之同時之碩儒顧炎武（1613-1682），則另闢蹊徑，著撰《日知錄》，標舉「讀九經字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」<sup>1</sup>之治經訓詁主張，標示以經學之重新審視與研究，以濟理學言談之窮途，從而成爲古學復興之先聲。其後又有閻若璩（1636-1707）、張爾岐（1612-1678）、胡渭（1633-1714）等，遂使以訓詁治經，考證經史之學，寢寢然漸盛；至於乾隆、嘉慶之間，碩彥儒鴻輩出，蔚成所謂「乾嘉學術」。

乾嘉學派於學術史上之表現，首先以惠棟（1697-1758）《易漢學》之完成爲揭竿大纛，其特色爲恢復漢儒《易》學爲宗。其後休甯戴震（1723-1777）出，於乾隆三十八年奉召入京，預修《四庫全書》，受朝廷禮遇；而漢學亦得朝廷之獎掖，風氣大盛，一時朝廷中之顯貴，多蜂擁而附庸風雅，務以博考經史是務，至於宋明理學則鮮復瞻顧矣。袁枚（1716-1797）《隨園詩話》云：「於是近今之士，競尊漢儒之學，排擊宋儒，幾乎南北皆是矣，豪健者尤爭先焉。」<sup>2</sup>學術之風至此，則是「經史考證」之學，遂成學術領導之地位，而乾嘉學派於焉鼎定。清末民初著名學者王國維（1877-1927）先生嘗論及清代學術，謂：「國初之學大，乾嘉之學精，而道咸以來之學新。」<sup>3</sup>王觀堂氏以一「精」字來概括乾嘉學術，其意甚是。蓋乾嘉之學，可謂「躋廣大而進精微」；而其中能以經學考證之精深研究，成績卓著而傲視群倫者，則當非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莫屬。

\*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

<sup>1</sup> 顧炎武著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四，〈答李子德書〉。

<sup>2</sup> 袁枚著：《箋注隨園詩話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4年）卷二，頁24，總頁72。

<sup>3</sup> 王國維著：《觀堂集林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《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》本，冊三，1976年）卷二十三，〈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〉，總頁1153。

王念孫（1744-1832），字懷祖。乾隆九年生（1744），道光十二年卒（1832），享年八十九歲。江蘇高郵人。生而清羸，故其後自號石臞。自幼聰慧，八歲已遍讀十三經，又旁涉史鑑。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進士，歷任翰林院庶吉士、工部主事、工部郎中、陝西道禦史、吏科給事中、山東運河道。嘉慶十四年（1809）六月，調任直隸永定河道。翌年，以淫雨連月，河水暴漲，永定河決堤漫溢，遂自請治罪，以六品休致。按照清朝法律，凡漫堤決口，按例應賠償損失十分之四，由有關官員按官位與責任大小共同承擔，王念孫應分賠二萬七千兩有餘。於是傾其家中全部積蓄，並向親友借貸，並其子王引之代賠，前後十餘年始得清償。贈光祿大夫，故其後人每稱「光祿觀察公」。

王念孫之父王安國，字書城，號春圃，雍正二年（1724）殿試一甲二名進士（榜眼），官至於吏部尚書，曾延聘戴震為其子念孫教授，王念孫於文字、聲韻、訓詁之學，蓋已得戴氏真傳。《清史稿》有記載：「初從休甯戴震受聲音文字訓詁，其於經，熟于漢學之門戶，手編詩三百篇、九經、楚辭之韻，分古音為二十一部。于支、脂、之三部之分，段玉裁《六書韻表》亦見及此，其分至、祭、盍、緝為四部，則段書所未及也。念孫以段書先出，遂輟作。」<sup>4</sup>年二十餘，與李惇（1734-1785）、賈田祖（1714-1777）晨夕過從，飲酒歌詩，議疑辨難，又常與劉台拱（1751-1805）、任大椿（1738-1789）、程瑤田（1725-1814）書信來往，研討古學心得，闡發許叔重、鄭康成之闡奧。翁方綱（1733-1818）嘗贈以楹聯云：「識過鉉、錯兩徐而上，學居後、先二鄭之間。」可見王念孫青年時學術造詣已相當高明，頗得時人推崇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年二十三，得江永（1681-1762）《古韻標準》讀之，始知顧氏所分十部，猶有罅漏。旋里餘暇，遂取《詩經》三百五篇，並參考《楚辭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易林》等書用韻，反復尋繹，始知江氏之書，仍未盡善，遂以己意重加編次，分古韻為二十一部，其晚年又進而分古韻為二十二部<sup>5</sup>。同時，對古書中文字的假借、聲音的通轉，皆有深入之體認。

王念孫平生篤守經訓，個性正直，好古精審，剖析入微。能充分運用因古聲以求古義，溯假借字以求本字，復加以意參探而不墨守之方法與態度，於從事經籍訓詁研探，所獲取之成效，令人矚目。其《廣雅疏證》之作，一改我國學術自古研讀文獻，於文字之學每多重形體而忽略其音聲；王念孫觀破此一局限，費時十年功夫，以《廣雅》為體而為之作注，援引經傳，博采衆說，詳加考徵，就古聲以求古義，其校正原書錯字、漏衍等訛誤之處甚多。該書對中國訓詁學之發展，奠下深刻典範之作用。嘗自言曰：「訓詁之旨，本於聲音，字之聲同聲近者，經傳往往假借。學者以聲求義，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，則煥然冰釋。」<sup>6</sup>其子王引之亦曾陳述其父治學之事曰：「大人之治經也，諸說並列，則求其是，字有假借，則改其讀。蓋熟于漢學之

<sup>4</sup> 《清史稿》列傳二百六十八，儒林二。

<sup>5</sup> 參見陳鴻森撰：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一文。見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七十六本第三分（2005年09月）。

<sup>6</sup> 王念孫著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王念孫撰《廣雅疏證·序》，頁1。

門戶而不囿于漢學之藩籬者也。」<sup>7</sup>王念孫除精通訓詁外，對於校勘，最擅專門，對文字謬訛、句讀錯亂、音訓異同，一一加以考辨，用力甚勤，且多創見；並總結出古書誤例之規律性，示後人用作校勘其他古書之通例，實具深遠影響。

於經史之外，王念孫亦鑽研、精熟水利工事，曾於工部為官期間，著《道河議》上下篇，並奉旨編纂《河源紀略》。後以永定河決堤漫溢，罷官歸里之後，以著述自娛，著有《讀書雜誌》，於古義晦澀之處、謄抄誤寫之訛，及後人校勘妄改之弊，皆逐一為之釐訂更正。其中每為考證一字，博及萬卷，其精於校讎，而用力之勤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王念孫生平主要著述有《讀書雜誌》、《廣雅疏證》、《道河議》、《河源紀略》，與其子王引之合作《經義述聞》等。

章太炎先生撰〈清儒〉一文，謂：「其成學著系統者，自乾隆朝始。一自吳，一自皖南；吳始惠棟，其學好博而尊聞；皖南始戴震，綜形名，任裁斷，此其所異也。……震又教於京師，任大椿、盧文弨、孔廣森皆從問業。弟子最知名者：金壇段玉裁、高郵王念孫。」<sup>8</sup>即清代之時，學界對乾嘉考據學成就最大者——戴震、段玉裁和王念孫、王引之（1766-1834）父子二人之學術，每合稱為「段、戴、二王之學」。兩廣總督阮元（1764-1859）於〈王石臞先生墓誌銘〉云：「高郵王氏一家之學，海內無匹。」<sup>9</sup>阮元亦清代學術之一大守護者，出力甚殷；彼乃王念孫之好友，亦為王引之之師傅，雖然關係匪淺，友誼非同尋常，然如此評語，衡之事實，固並非朋友間之互相虛譽吹捧，實乃平心之論。與王念孫同時者，尚有錢大昕（1728-1804）、盧文弨（1717-1795）、邵晉涵（1743-1796）、劉台拱（1751-1805），合稱「五君子」。焦循（1763-1820）作〈讀書三十二贊〉，其稱王念孫所著《廣雅疏證》及與其子王引之合作之《經義述聞》云：「訓詁聲音，經之門戶。不通聲音，不知訓詁。訓詁不知，大道乃沮。字異聲同，義通形假。或轉或因，比例互著。高郵王氏，鄭、許之亞。借張揖書（即《廣雅》），示人大路。《經義述聞》，以子翼父。」<sup>10</sup>《清史稿》稱頌高郵王氏一門：「清經術獨絕千古，高郵王氏一家之學，三世相承，與長洲惠氏相埒云。」<sup>11</sup>梁啟超先生亦謂：「王石臞之讀書雜誌，……石臞應用第二種校法第二種校法最精最慎，隨校隨釋，妙解環生，實為斯學第一流作品。」<sup>12</sup>學術上稱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，洵為乾嘉學術之代表性人物。

楊樹達先生曾比較王念孫與郝懿行兩者之學術成就云：

清儒以治雅學顯名者，得二人焉：一曰高郵王氏，一曰棲霞郝氏，然郝氏非王氏比也。

王氏精通聲韻，條理粲然，其聲義通貫之美，前人所未有也，讀其書者令人想見其悠然

<sup>7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9年）〈經義述聞·自序〉。

<sup>8</sup> 徐亮工編校，章太炎、劉師培等著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5-6。

<sup>9</sup> 阮元著：《學經室續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，1985年）冊二，卷二之下卷，頁93。

<sup>10</sup> 焦循著：《雕菰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，1985年）冊二，卷六，頁88。

<sup>11</sup> 《清史稿》〈列傳〉二百六十八。

<sup>12</sup> 梁啟超著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臺北：華正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252。

自得，躁是矜平之象焉。郝氏於聲韻本無通解，（郝書所舉雙聲疊韻多誤說，不足據）經傳義訓足以甄明雅詁者，既未能博采；間有聯貫，則矜躁之氣，溢於文詞。又其人嘗見王氏書，成書遠在其後，不能追美，顧反劣焉，尤可愧也。余謂今之欲治雅故者，當略依王氏之法為之，經傳義訓與雅訓相涉者，自常語外必盡錄之，而尤在廣貫聲義相近之字。……近二十年來，研治雅故，如王氏之創通大義，卓然能自立者，他未見也。<sup>13</sup>

對王念孫學術之推崇，可為至矣。於此皆可見後之學人於王氏之學，無不稱許有加，並以之為範式焉。

王氏父子之治學，其特色約可歸納，分為四項：其一為「博涉約精，貫通融會」；其二為「實事求是，無徵不信」；其三為「廣蒐眾說，擇善而從」；其四為「條理分明，統歸周全」。

## 二、有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王念孫手稿

王念孫之學術地位既如前述，然則研究其學術之遞變，學說之傳遞傳承關係，從中瞭解其研究之方法，於學術研究及學術史之構築上，至為重要。今所見王念孫之著作，已是其學說成就之結果定式，而其中形成之過程，多已泯隱無跡。是今所見王念孫手稿，則往往為其早年之見解與論述；此對於研究王氏學說形成、傳遞、繼承之跡，具關鍵性之效用。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《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一函。其主要內容乃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論述經義、音韻、訓詁等之文稿。該手稿原題為《王念孫手稿》，然其中亦有王引之手稿在焉，而且為數甚多，故當名為《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為是。<sup>14</sup>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宗焜嘗據此資料，編撰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<sup>15</sup> 一書，即用是題名。

該批手稿係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由羅莘田（常培）先生遞交中研院收藏。手稿原裝成八冊又三十九頁，後來重裱成一函十七冊，每冊一至若干篇，每函頁數不等。《手稿》中除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手澤之外，偶有「同按」夾簽，則是王引之四子王壽同（1805-1853）所批註文字；函中有〈觀其自養養齋燼餘錄〉部分，即王壽同所撰。《手稿》書眉或有「已錄，恩炳記」題記；恩炳為王壽同第三子。是《手稿》雖以王念孫、王引之手稿為主，然校讀、抄錄等工作，實際含有王氏一門至少四代心血存在。<sup>16</sup>

李宗焜既對王氏父子手稿曾作深入之研究，且著為專書，故以下先就李氏對此部分手稿，作出之處理與論證，整理陳述，然後再進行檢討及議論。

本論文研探之重點，在王念孫手稿中論經義函手稿，即李宗焜所謂〈經義雜誌〉部分者；

<sup>13</sup> 楊樹達著：《積微居小學述林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1年）〈溫故知新說〉一文，頁215。

<sup>14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0年）頁3，有言曰：「張政烺先生在此之下有一段題記說：『此名未安，當題《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因內有王伯申手稿，且甚多也。』」

<sup>15</sup> 參見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。

<sup>16</sup> 參見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3-4。

李宗焜於其所謂〈經義雜誌〉部分手稿有以下之論述：

### （一）對於篇題

手稿於經義論述部分，原題爲〈王念孫論韻十八條〉，李宗焜則改題爲〈經義雜誌〉。李氏之意謂：「本篇爲王念孫之讀經雜記，抄錄以寄友人。〈程目〉原題〈王念孫論韻十八條〉，但其中討論音韻的只有二條，全文則均爲討論經義的意見，故仿王氏《讀書雜誌》之名，改題爲〈經義雜誌〉。」

### （二）對於論經義條數

王念孫手稿中有謂「倉卒錄得十八條，本欲再謄清呈閱，恐再遲則緩不及事，且案頭無書，不能考證，祇據意見所到爲之，故多所未安，務祈考訂原書，重加改正，文不成文，字不成字，惟知己諒之而已。」手稿原題亦曰「論韻十八條」，李氏以爲當爲二十條。李氏曰：「王氏所謂的『倉卒錄得十八條』也有問題；經過整理，本篇所討論的經義共二十條，因原稿較亂，有時一條寫完正好到一行的最底部，下一條另行頂格寫，『倉卒』間，就被誤爲一條，因此有數量上的出入。」

### （三）手稿所論經義與《經義述聞》之關係

王念孫手稿中所論及之經義條目，其中部分收入後來之《經義述聞》中。李宗焜謂：「本稿有若干條，王引之據之寫入《經義述聞》，文字互有詳略。」<sup>17</sup>而於下文則云：「本所所藏王念孫〈經義雜誌〉手稿，札記經義二十則，其中九則的內容寫入《經義述聞》（《經義述聞》先後有嘉慶二年家刻的不分卷本、嘉慶二十二年盧宣旬刻的十五卷本、道光七年壽藤書屋的三十二卷本。不分卷本及十五卷本無《爾雅》，這裏所說的「九則」指三十二卷本而言，釋文中所標示的頁碼也是指三十二卷本）。」<sup>18</sup>

### （四）論手稿之價值

王念孫之手稿，王氏雖自謂「案頭無書，不能考證；祇據意見所到爲之，故多所未安。務祈考訂原書，重加改正，文不成文，字不成字」，其本即倉促間抄錄而成之草稿，然此正代表王氏平日研究之情狀，及瞭解其學說形成軌跡之第一手資料。李宗焜曰：「王氏父子是乾嘉學術的代表人物，他們的手稿即使只作為歷史文物來看，其價值都不容小覷，作為學術資料來說更是價值不菲。本所所藏《手稿》中，有些是初稿本，這些初稿本有的是未經刊刻發表的（如〈經義雜誌〉中的部份內容），有的是雖有刊刻發表，但初稿本的內容與之頗有出入而足資考訂的（如王念孫〈與李邨齋方伯論古韻書〉）。〈經義雜誌〉中的部份內容後經王引之寫入《經義述聞》中，而冠以「家大人曰」，還原到王念孫的初稿是什麼面貌，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探討。」<sup>19</sup>李宗焜經對比王氏論經義手稿與《經義述聞》之後，以爲「從王念孫的手稿，跟《經義述聞》「家大人曰」

<sup>17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9。

<sup>18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40。

<sup>19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37。

的內容作比較，雖然仍是王念孫的意見，但並不是像把「念孫案」改為「家大人曰」那麼簡單。」<sup>20</sup> 因而肯定王念孫之子引之為《經義述聞》所投注之心力與研究成果，反對以《經義述聞》為王念孫所作，而著其子引之名字之論調。

至於該手稿緣何而作？何時抄錄付寄？收受者為誰？諸多問題，李氏曾謂：「本篇為王念孫之讀經雜記，抄錄以寄友人。」<sup>21</sup> 顯然此乃書信一封；然而「友人」為誰？何以王念孫將一己平日讀經所得，抄錄付寄？此手稿與《經義述聞》比較，雖可知其時間當在《述聞》之前；然此於研究王氏學術演變過程，仍失之含混，當更求其精確之書寫時間，始能顯其效用；而李宗焜皆未之探求。

### 三、對王念孫論經義函手稿之再議

前述李宗焜於其著作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一書中，所論有關手稿之「篇題」、「論經義條數」、「手稿與經義述聞之關係」以及「手稿之價值」，皆有可議之處；而其關鍵則在於此一手稿究竟付寄何人？若求得所付寄之人，當能牽連不絕，鉤抉累累，其或有可觀者存焉。

#### （一）論經義函手稿中論經義條數

首先就手稿中所論列之經義條數，究竟其數為何？王念孫於文中明言「倉卒錄得十八條」。而李宗焜則謂此條數有問題，李氏經整理手稿，認定當有「討論經義」文共二十條；並分析所致誤之由，以為乃「因原稿較亂，有時一條寫完正好到一行的最底部，下一條另行頂格寫，『倉卒』間，就被誤為一條，因此有數量上的出入。」

細觀原手稿所錄條數，以總量而言，確為二十條；然其中總數之第三條論「《書·益稷》『笙鏞以閒』」條，王念孫旁注曰：「此條犯某公諱，故刪。」王念孫並於文段前後加上大筆鉤乙符號，以示刪除。手稿中有此鉤乙刪除符號者，尚有總條數第六條論「《鄭·羔裘》首章『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』」條。故王氏謂有十八條者是也。

王念孫所鉤乙者當刪去，王氏不數；據手稿中情況亦可以知之。察夫手稿中有此大段鉤乙符號處，尚有第九條論「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」者，而是條亦見於《經義述聞》第十六卷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〉條，手稿中被鉤乙處，今不見於《述聞》中，可見手稿中之鉤乙符號實為刪除之用。由是知之，王念孫所謂「倉卒錄得十八條」，乃是以所錄之總數，減除鉤乙刪去者兩條，固為「十八條」，並非王氏誤數條數，更非誤合兩條為一條也。

#### （二）論經義函手稿所付寄者

就論經義函手稿之收受人而論，李宗焜止泛言「友人」，未知為誰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鴻森先生嘗為文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一文，其中論及王念孫論經義函手稿所付寄者。其言曰：

<sup>20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40。

<sup>21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9。

按史語所傳斯年圖書館所藏王念孫手稿，中有編者（指李宗焄）題〈經義雜誌〉者，凡二十條。其一條（指手稿總數中之第十六條）云：

《書·洪範》：「身其康彊，子孫其逢吉。」（《注疏》及監本皆不在案頭，祈考入。此條本出足下，不過增成之耳。）「子孫其逢」當絕句，《釋文》引馬融云：「逢，大也。」猶言其後必大耳。……（此條足下再增成之可也。）……按〈洪範〉此文，舊讀並以「子孫其逢吉」五字為句，李惇《群經識小》始讀「子孫其逢」絕句，「吉」字自為句；「逢」字訓大，猶言其後必昌大耳。王稿既言「此條本出足下」云云，則此件必王氏寫錄平日肄經所得，以就正於李惇者。<sup>22</sup>

陳鴻森先生所言極是。考今李惇之《群經識小》，中有〈子孫其逢〉條，其文曰：

「身其康彊，子孫其逢吉。」先儒「逢吉」二字連讀。謹案：此節通體用韻，當讀至「逢」字絕句，與上文五「從」字，一「同」字音韻正叶；「吉」字另作一句，與下文五「吉」字、二「凶」字體例更合。「逢」訓為大，《釋文》引馬融云：「逢，大也。」猶言其後必大耳。《禮記·儒行》「衣逢掖之衣」，鄭注云：「逢猶大也」，又訓為「豐」，豐亦大也。《禮記·玉藻》「縫齊倍要」，鄭注云：「縫或為逢，或為豐」，是古逢、豐聲義皆同也。體例、訓詁、聲音三者皆合，理無可疑。<sup>23</sup>

其說正如王念孫手稿所言，且其文句與手稿所述亦多有相同之處，正是李惇據王念孫之說「考入」、「增成之」者。今再考《經義述聞》第三〈尙書上〉中，有論〈子孫其逢〉一條，其言曰：

「女則從，龜從，筮從，鄉士從，庶民從，是之謂大同，身其剛康彊，子孫其逢吉」，傳以「逢吉」連讀，解為遇吉。家大人曰：余友李氏成裕曰：「當讀至『逢』字句絕，與上文五從一同字，音韻正協，吉字別為一句，與下文五吉字、二凶字，體例正合。據傳以此為大吉，下文三從二逆為中吉，二從三逆為小吉，中吉、小吉且言，況大吉乎！」案此說是也。<sup>24</sup>

按王引之明言此乃「家大人（王念孫）曰：余友李氏成裕」之言。李成裕者，即李惇，字成裕是也。<sup>25</sup> 王念孫於道光六年，年八十三時為《群經識小》作序，其言曰：

《群經識小》者，余友李進士成裕之所作也。……兒子引之撰《經義述聞》，載進士經說二條，一為「子孫其逢」，一為「濟盈不濡軌」，皆至當不易之論，可謂獨有千古矣。<sup>26</sup>

<sup>22</sup> 陳鴻森撰：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，頁450-451。

<sup>23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，卷七二〇，頁13。總頁13018。

<sup>24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，頁89。

<sup>25</sup> 阮元：《學經室續集》卷二〈高郵孝臣李君傳〉云：「李先生諱惇，字成裕，又字孝臣。」按李惇之名與字，其關係出於《尚書·洛誥》：「惇大成裕，汝永有辭。」又《禮記·內則》：「惇行孝弟。」

<sup>26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，冊173，據清道光五年李紫培重刻本），

凡此等文獻資料，皆足以證明《尚書·洪範》「子孫其逢」絕句之說，實出於李惇所創無疑。然則此論經義書信手稿，當為王念孫抄錄研究經義所得，付寄李惇者也。

李惇乃王念孫論學同道，相知甚深。王引之撰〈石臞府君行狀〉，記石臞與李惇之事曰：

年二十二，……恩賜與人，一體會試。府君感戴皇恩，益敦學業。居鄉則與李孝臣先生惇、賈禮耕先生田祖晨夕過從；又與江都汪容甫先生中、寶應劉端臨先生台拱、興化任子田先生大椿、歙程易疇先生瑤田書札往還，講求古學。<sup>27</sup>

王念孫於重刻李惇《群經識小》序，文中有言曰：

余自壯年有志於鄭、許之學，攷文字，辨音聲，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。逡巡里下，同志者卒鮮；唯進士與余有聲氣之應；晨夕過從，無間風雨；市酒一桮，園蔬數器，抵掌而談，莫非古義；有所疑則相問難，有所得則相告語；聞者或訕笑之，而進士與余不殷之而少沮也。<sup>28</sup>

可知中研院所藏王念孫論經義函手稿，即當時王、李間「有所得則相告語」之明證。阮元撰有〈孝臣李先生傳〉<sup>29</sup>，可見李惇生平。其文曰：

李先生諱惇，字成裕，又字孝臣。先世蘇州人，遷揚州、高郵州。祖父皆以文學，力行善事，司普濟育嬰堂，盡其力施藥救病，節衣食為之。先生幼讀書穎異；七歲即知解經，有神童之目。十三歲孤。既長，博極群書，尤遂經傳；與同里賈君稻孫、王君懷祖同力于學。興化顧君文子、任君子田、寶應劉君端臨、江都汪君容甫、歙程君易田，皆學術摯摩，極一時之盛。先生以品行為立身定命之本，事母孝，侍疾居喪，皆盡禮。貌質直寡言，惟講學則盡其辨。乾隆丁酉（四十二、1777）試拔貢，學使謝金圖侍郎屬意焉。及試期不來。詰之，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于泰州試館，先生營棺斂事，竟不赴試。學使歎曰：「李生以博學名，而敦行復乃爾，誠今之古人也。」己亥（四十四，1779）中式舉人。庚子（四十五，1780）會試中式第

書前附王念孫序文，頁1。

<sup>27</sup> 王引之撰：〈石臞府君行狀〉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，卷四，頁7515。

<sup>28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，頁1。

<sup>29</sup> 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李惇著《群經識小》前附，阮元《學經堂文集》亦有之。又汪中亦有〈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并序〉，亦有助於瞭解李惇生平，資附錄餘下：

君諱惇，字孝臣，高郵仁。……君治諸精通敏，于詩、春秋尤深，作義解數十條，義並精審。晚好歷算，得梅氏書，盡通其術。是時古學大興，元和惠氏、休寧戴氏，成為學者所宗。自江以北，則王念孫為之唱而君和之；中及劉台拱繼之，並才力所詣，各成其學；雖有講習，不相依附。君于年為長，三人者兄事焉。君知鬼神情狀，不惑于非類；于宋以後愚誣之學，距之尤力。內行淳篤，臨財無苟，與人交，恂恂退讓，己所不為，不以責人；己所知，不與人爭。其所親善，死生貧富，不以易其心。既久困諸生籍，以高第將貢于國學，其夕執友賈田祖死，君遂不入試，而親棺斂以歸之。君身短不及中人，貌質樸，嗜酒，善諧笑；至其執心尚義，勇于為人，雖賁、育不過也。乾隆四十五年君成進士，注選知縣。越四年病卒，年五十有一。中既與君久要，得詳其行誼。《述學·外篇一》，頁九，總頁410。）



二；學使彭芸楣先生聘主暨陽書院，勵諸生以經學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年五十一以疾卒；子文學培紫、培碧降服；培青克紹先業。先生著有《群經識小》、《左傳通釋》、《古文尚書論》、《毛詩三條辨》、《渾天圖說》、《讀史碎金》諸書，而《識小》八卷，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，事事精確不磨，發前人所未發。元已刻入《皇清經解》。

阮元所刻李惇《群經識小》，與李惇子李紫培所重刻《群經識小》，內容大體相同，其中仍有小異，下文將詳加論述之。

### （三）論經義函手稿之篇題

根據李宗焜所述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王念孫手稿，原有程霖所編之目錄。程氏所編目錄，於王念孫論經義函手稿題為〈王念孫論韻十八條〉，然考校其內容之實，其中論及音韻者僅兩條，其他條文皆為討論諸經經義問題者，故程霖所題之目，實有可議之處。李宗焜則以為「故仿王氏《讀書雜誌》之名，改題為〈經義雜誌〉」。然李氏之所以有此改題，乃因不知書信所付寄者為誰故爾。而今根據前項分析，已知收信者確為王氏好友李成裕惇，則宜按命篇慣例，加入受信者姓名為是。

史語所所藏王氏手稿中，有〈與李鄴齋方伯論古韻書〉，其內容乃討論音韻之學，至為明白。而王念孫論經義函手稿則非為有所討論，實為抄錄所論經義寄予李惇參考，而不祈有所辯難討論者。王氏手稿末附言云：

倉卒錄得十八條，本欲再謄清稿呈閱，恐再遲則緩不及事，且案頭無書，不能考證，祇據意見所到為之，故多所未安。務祈考訂原書，重加改正。

由王氏所言，可見此函實非為討論，乃為一特定事件而為之者；王念孫先提供經義意見，李惇則「考訂原書，重加改正」，然後即可用之於「事件」而已。

根據以上分析，筆者以為王念孫論經義函手稿，宜重新命名為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<sup>30</sup>，如此既合乎王氏手稿本旨，亦能使讀者望題而知其內涵及其所收受者也。（以下論文即用此題名）

## 四、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之再研探

由中研院所藏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，其可據以探論之問題極多，茲陳述、分析、討論如下：

### （一）關於王氏父子學術成就之歸屬問題

李宗焜以其所謂〈經義雜誌〉手稿，對比《經義述聞》，以見王引之所採錄之條數有九，並以對比之結果，論《經義述聞》之真實作者，究為王念孫抑或王引之？李氏書中有一節論〈王氏父子的版權問題〉，其論曰：

<sup>30</sup> 「雜錄」，乃據手稿「錄得」一詞，「雜」指「倉卒」之結果，及王氏「讀書雜誌」之意。

《經義述聞》中的確有許多「家大人曰」的意見，王引之也確曾「略入己說」，有些「家大人曰」之後，甚至沒有半點王引之的意見，但並不是全書都如此。《經義述聞》既然是王引之「謹錄所聞於大人者」，則這位「大人」對這些意見一再增補自然是情理中的事。除了「大人」的意見外，《述聞》中「引之謹案」的內容仍然甚多，通篇為「引之謹案」而沒有王念孫意見的亦隨處可見，這就不僅僅是「略入己意」而已了，除非我們能證明這些「引之謹案」，原來都是「念孫案」。<sup>31</sup>

本所所藏王念孫〈經義雜誌〉手稿，札記經義二十則，其中九則的內容寫入《經義述聞》（……這裏所說的「九則」指三十二卷本而言，……），王念孫〈古音義零稿〉也有二則寫入《經義述聞》。從王念孫的手稿，跟《經義述聞》「家大人曰」的內容作比較，雖然仍是王念孫的意見，但並不是像把「念孫案」改為「家大人曰」那麼簡單。<sup>32</sup>

李氏經辯論之後，其最後結論以為：

若如劉盼遂所論，謂引之「不自著書」，或竊改「念孫案」為「引之曰」便「名為己作」，我們從情理和事實的分析，認為這是厚誣古人的說法。<sup>33</sup>

李氏認為王引之並無將「念孫案」改為「引之案」；王念孫雖曾於《經義述聞》用力甚深，然而王引之於《經義述聞·序》已經明言「謹錄所聞於大人者」，「又由大人之說觸類推之」，「不揆愚陋，輒取一隅之見」，或又「略入己說」，故書命名曰「述聞」以示「志義方之訓」之意，其所言並非虛妄。

中研院史語所陳鴻森先生則不以爲然，以為「王引之對其父晚年古韻學之改變；實無所悉。蓋其時王引之歷官樞府要職，政務煩冗，不復能用心於學，父子共研經義之事，殆不可復得。今詳考其事歷，及王念孫與諸友論學書翰，乃知今本《經義述聞》較二刻本所增多之條目，實多出王念孫之手，特王氏託名歸美其子引之耳。」<sup>34</sup> 王念孫於古韻之研究，晚年改其「廿一部」之說為「廿二部」，王引之未之知，可見彼於其父晚年之學術研究多無所悉，則經義述聞三刻所增之條目，王引之實無能為力也。然陳氏之見與李氏有所不同，李氏所論在王引之未竊奪其父之說，陳氏則欲證明乃王念孫「託名歸美」其子引之。

欲就李氏之說而破之，必舉原為「念孫案」而後更為「引之案」之實例以為證，則可矣。蓋李氏據手稿與《經義述聞》對比而論，雖未見竊奪之跡，然其條數有限，論證仍欠周延。陳鴻森先生則舉劉盼遂《高郵王氏父子年譜》曰：

去歲傅氏斯年收得王懷祖《呂氏春秋雜誌》稿本，以較《讀書雜誌》，則凡引之說者，

<sup>31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38。

<sup>32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40。

<sup>33</sup> 李宗焜編撰：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頁43。

<sup>34</sup> 陳鴻森撰：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摘要。

皆為「念孫案」也。<sup>35</sup>

並以爲此稿本今不知流落何方，無從比較以求其真實情形；惟許維通撰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嘗據此稿本載入。許氏《集釋》卷首有〈引用諸書姓氏〉，於王念孫條下，列有《呂氏春秋》校本（原注：即《呂氏春秋雜誌》初稿，依畢刻本）；今本《讀書雜誌》於《呂氏春秋》部分僅有三十八條，而許維通《集釋》引王氏之說共三百零六條。然《集釋》所引王石臞氏之說，多不見於今本《讀書雜誌》，故亦無從考校。

陳先生又引許維通所纂〈郝蘭皋夫婦年譜〉，於嘉慶九年條下曰：

二月初，安人作〈列仙傳校正敘〉。

維通案：……《列仙傳》凡引「藏本」云云，皆出先生（森按：指郝懿行）手。蓋當時藏經之閣，安人不得登焉，故先生助之。與王石渠校《呂氏春秋》，託名其子伯申，迥乎不同。（原注：《呂氏春秋雜誌》計引伯申十條，今覆按底本，有七條為石渠所校。又〈十二紀〉「雷始收聲」條，陳觀樓引作「石渠云」，與底本合；而《經義述聞》校〈月令〉為「引之案」，其痕跡不可掩矣。<sup>36</sup>

許氏所言《十二紀》中「雷始收聲」一條，陳觀樓（昌齊）引作王念孫說，與彼所見《呂氏春秋雜誌》稿本相同。考乎今本《經義述聞》卷十四〈禮記上〉「雷始收聲」條中，則引作「引之案」。陳鴻森先生以爲「此《述聞》王念孫以己說為『引之案』之確據也」。陳先生更進而考證曰：

檢《淮南雜誌》卷十三，〈精神篇〉「撞巨鐘，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。」王念孫云：「『性』字義不可通，『性』當為『始』，古人多以『乃始』二字連文。」二書下文所引群籍「乃始」文例多同，此正可為許說之驗也。<sup>37</sup>

其文中雖未引出《述聞》「雷始收聲」與《淮南雜誌》中「乃性、乃使始」條<sup>38</sup>考證之文例，然經對比二者，確是大體相同，《淮南》、《莊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韓子》、《呂氏》等皆同，似可成為定論。<sup>39</sup>

然據筆者所見，《述聞》有引「《韓策》曰：『韓亡每人與金，其疏秦乃始益明。』」此《雜誌》中所無；《雜誌》引「《淮南·俶真》篇：……又曰：『儒墨乃始列道而議，分徒而訟。』」則為《述聞》所未有。今再考《讀書雜誌·逸周書雜誌》亦有「雷始收聲、雷不始收聲」條，

<sup>35</sup> 劉盼遂編：《高郵王氏父子年譜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2年），頁40。

<sup>36</sup> 陳鴻森撰：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，頁449。

<sup>37</sup> 陳鴻森撰：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，頁458。

<sup>38</sup> 王念孫著：《讀書雜誌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志九之七，頁九，總頁826。以下凡引用《讀書雜誌》者，皆據此本，不再詳述版權。

<sup>39</sup> 陳鴻森先生持如此論述之文章，尚有〈《經傳釋詞》作者疑義〉一文，刊於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總第八十四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29-74。

其文曰：

秋分之日，雷始收聲。引之曰：「『雷始收聲』本作『雷乃始收』，此後人依俗本〈月令〉改之也。下文『雷不始收聲』亦本作『雷不始收』。說見《經義述聞》〈月令〉。」<sup>40</sup>

此條亦明言「引之曰」，則《述聞》與《讀書雜誌》兩條皆同謂「引之曰」也。前述許氏所云《呂氏春秋校本》底本於「雷始收聲」條指為「念孫案」，今不見其「底本」究為如何，未敢遽作定判。且陳鴻森先生明言〈月令〉「雷始收聲」一條，《述聞》初刻本已有之，<sup>41</sup>而《讀書雜誌》之《逸周書雜誌》則乃王念孫晚年之作，<sup>42</sup>猶謂之「引之曰」，是石臞自壯至老，皆念茲在茲以此條為「引之曰」也；果如其稿本確作「念孫案」，此實難以理解。今考王念孫校《呂氏春秋手稿》，現藏於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中，並已轉成數位檔案，供學者參閱。茲查考「雷始收聲」一條下，並未見有「念孫案」、「引之案」字樣，<sup>43</sup>不可遽定為誰所校者。陳觀樓雖引作「石渠云」，或是以為《讀書雜誌》乃以王念孫為作者之名，遂逕謂之「石渠云」爾。

至於許維通謂今本《呂氏春秋雜誌》中所載「引之曰」有十條，而覆按其所見之「底本」，有七條為石渠所校。今本《讀書雜誌》於《呂氏春秋》部分有三十八條，作「引之曰」者十條，誠然；然細加覆覈其文，並對比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相關論述，似非如是。茲分析如下：

#### 1、「苓管」條（頁1021）<sup>44</sup>：

「吹苓管堽簾」。引之曰：「苓當為苓，即笙字也。古從生聲之字，或從令聲。笙之為苓，猶旌之為旂也。隸書從竹之字，多變從艸，故苓訛作苓。或曰簫字之訛竹誤為艸，又脫下半耳。」

根祥按：此條與下列第3條有關，詳見下文。此條許維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五〈古樂〉引「王引之曰」<sup>45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

#### 2、〈憂恨〉條（頁1022）

〈懷寵篇〉：「憂恨冒疾，遂過不聽。」引之曰：「憂恨與遂過不聽義不相屬。憂當為復，復與愎同。隸書復字或作夏，憂字或作𣎵，二形相似而誤。恨與很同。《莊子·漁父》

<sup>40</sup> 王念孫著：《讀書雜誌》，志一之三，頁3，總頁17。

<sup>41</sup> 陳鴻森撰：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，頁459。

<sup>42</sup> 據《昭代經師手簡》頁181，王紹蘭〈致王引之書二通（二）之二〉云：「前歲奉到手書，承賜〈逸周書雜誌〉一帙，當即肅函覆謝。」案信末署時推知，當為道光八年（1828），王念孫時年八十五矣。在此之前，未見有關〈逸周書雜誌〉之記載，則可推知為晚年所作者也。

<sup>43</sup> 根祥案：王念孫校呂氏春秋手稿，此條「雷始收聲」之天頭書字曰：「注內舉正文無聲字，此字乃妄人所加。《淮南·時則訓》及《初學記》引〈月令〉、《類聚》、《書鈔》引《周書·時訓》，並作「雷乃始收聲」是也。自唐《御修月令》始改作「雷乃收聲」，而今本〈月令〉及今本《周書·時訓》，遂並作「雷始收聲」矣。」

<sup>44</sup> 此條并下列所論共十條，所附頁數皆以王念孫著《讀書雜誌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之頁碼為準，不另外說明。

<sup>45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6年）卷五〈古樂〉，頁18。

篇曰：『見過不更，聞見愈甚謂之很。』《說文》曰：『很，不聽從也。』宣十二年《左傳》注曰：『愎，很也。』故曰『愎很冒疾，遂過不聽』。《逸周書·諡法》曰：『愎很遂過曰刺』。《荀子·成相》篇曰：『恨愎遂過不肯悔。』義並與此同。」

根祥案：此條許維通《集釋》中作「王引之曰」<sup>46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上文所論，其相關論證文獻，與《讀書雜誌·荀子雜誌》中〈恨後遂過〉<sup>47</sup>條大體相同，《荀子雜誌》條記為「念孫案」。考之王氏父子著作中，使用相同之文獻證據，以論辨古籍中類似之論題，因而獲得結果者，如此情形，所在多有，一如前述陳鴻森先生所指出之《述聞》「雷始收聲」與《淮南雜誌》中「乃性、乃使始」條考證之文例，亦大體相同。若以此而論謂王引之竊掩其父之說，或以為王石臚託名以美其子，皆有「原心論罪」之嫌。蓋石臚先得一條證，而引之聞且閱而知之；日後引之校讀古籍之時，見有類似之情狀，因引用相同之材料以論證其事，若此者可得謂「竊掩他人之說」乎？「託名歸美予人」乎？猶如愛因斯坦發明相對之論，因得「 $E=MC^2$ 」之公式，從而發展出原子彈、氫彈、核能發電等科技；然吾人不可因而謂後來所有科技發展所得，皆愛因斯坦所有也。

### 3、〈載旂旒輿，受車以級〉（頁 1022）

〈季秋篇〉「命僕及七駟咸駕，載旂旒（旂與旒同）輿，受車以級，整設于屏外」。高注曰：「田僕掌佐車之政，令獲者植旂，故載旂也。輿，眾也；眾當受田車者，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。」引之曰：「注言『載旂而不及旒，則旂下無旒字，蓋後人據〈月令〉加之也。《淮南·時則》篇作『戴旒』，旒即旒之訛。旒下亦無旒字，當刪去。其輿字當讀為旗，屬上句讀。〈月令〉云『載旒旒』，此云『載旂旗』，旗、旒皆旒旂之屬，各舉一物言之耳。高以輿字屬下句讀，又訓為眾，皆失之。」

根祥案：許維通《集釋》卷九記為「王引之曰」<sup>48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此條與前第 1 條相關。考《讀書雜誌·淮南內篇》第五有「戴旒」條，記為「念孫案」，其文謂「劉績曰：『戴旒，記作『載旒』，疑旒乃旒字之誤。』念孫案：『劉說是也。隸書旒字或作旒，與旒相似而誤。』」<sup>49</sup>今觀乎王引之所言，實得於其父「戴旒」之辨說，並推論而得「載旂」即「載旒」，無「旒」字，復擴而充之謂「令、生」聲相通，因得第 1 條「苓管」本作「箒管」，意即「笙管」之說。由此可見，此論題乃王念孫啓其端，而王引之引而申之也，不可逕謂「竊掩」、「託美」也。

### 4、〈乃參于上〉（頁 1024）

「冬至日行遠道，周行四極。夏至日行近道，乃參于上」。高注曰：「遠道，外道也。故曰周行四極。近道，內道也，乃參倍于上，夏日高也。」引之曰：「高讀『參』為三，

<sup>46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七〈懷寵〉，頁 16。

<sup>47</sup> 王念孫著：《讀書雜誌》，志八之八，頁 6-7，總頁 732-733。

<sup>48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九〈季秋〉，頁 4。

<sup>49</sup> 王念孫著：《讀書雜誌》，志九之五，頁 4，總頁 812。

非也。『參』如『立則見其參之於前』之『參』，參由值也；言正值人上也。夏至日行北道，日中之時，正值人上；故曰近。《墨子·經》篇曰：『直，參也。』直與值同。《淮南·說山》篇『越人學遠射，參天而發，適在五步之內』，高注曰：『越人習水，便舟而不知射。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，勢盡而還，故近在五步之內。參猶望也。』案：參天而發，謂值天而發也。高訓參為望，易失之。」

根祥案：許維通《集釋》謂為「王引之曰」<sup>50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今考夫《讀書雜誌》中並無其他相關之論說，故不可考知其中關係。

#### 5、〈煙火〉（頁 1025）

〈應同〉篇「早雲煙火，雨雲水波」。引之曰：「煙當為『爍』字之誤也。《說文》『爍，火飛也，讀若標』，《一切經音義》十四引《三倉》曰『爍，迸火也』。『早雲爍火，雨雲水波』猶言早雲如火，雨雲如水耳。若云『早雲煙火』，則與下句不類矣。《藝文類聚·天部上》、《初學·記天部》、《太平御覽·天部八》引此並誤作『煙』；唯舊本《北堂書鈔·天部二》出『爍火』二字，引《呂氏春秋》『早雲如爍火』，則所見本尚未誤。〈慎小〉篇曰：『突泄一爍而焚宮燒積。』《韓子·喻老》篇曰：『百尺之室，以突隙之爍焚。』《淮南·齊俗》篇曰：『闢若水之下流，爍之上尋也。』〈說林〉篇曰：『一家失爍，百家皆燒。』《史記·淮陰侯傳》曰：『爍至風起。』《漢書·序傳》曰：『勝、廣爍起，梁、籍扇烈。』皆其證也。魏徵《群書治要》引《尸子·貴言》篇曰：『爍火始起，易息也。』《吳越春秋》『句踐入臣』，傳曰：『目若爍火，聲如雷霆。』此尤『爍火』二字之明證。而今本《晏子》、《韓子》及《淮南·覽冥》、〈齊俗〉、〈人間〉三篇，字皆誤作『煙』。唯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吳越春秋》、《淮南·說林》及《群書治要》、《一切經音義》、舊本《北堂書鈔》所引不誤。世人多見『煙』，少見『爍』，固宜其沿誤而不知也。」

根祥案：許維通《集釋》謂為「王引之曰」<sup>51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考《淮南雜志》中〈覽冥〉下有「煙」條<sup>52</sup>，論「早雲煙火，淞雲波水」中「煙火」，與此正同，而亦記作「引之曰」，所引論證大致亦同；文末猶謂「說見《呂氏春秋》『煙火』下」。則此條當是王引之得意之獲也。

#### 6、〈厚用〉（頁 1025）

〈孝行〉篇「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，可謂善養矣」，高注曰：「代，更；更次用之，以便親性，可謂為善養親也。」引之曰：「厚當為序。隸書厚字或作厚，又作厚（見三公山碑），形與序並相近，故序訛為厚。代進而序用之者，序亦代也。〈燕禮〉『序進』，鄭注曰：『序，次第也，猶代也。』〈郊特牲〉『昏禮不賀人之序也』，鄭注曰：『序猶代也。』是序與代

<sup>50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十三〈有始〉，頁 6。

<sup>51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十三〈應同〉，頁 9。

<sup>52</sup> 王念孫著：《讀書雜誌》，志九之六，頁 2-3，總頁 814-815。

同義。《楚辭·離騷》『春與秋其代序』是也。高訓『代』為『更』，『序』亦『更』也。

《周官·御僕》『以序守路鼓』。〈公食大夫禮〉『序進』。〈仲尼燕居〉『夏簫序興』，鄭注並曰：『序，更也。』序與次亦同義，故高云『更次用之』。」

根祥案：許維通《集釋》謂為「王引之曰」<sup>53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考《讀書雜誌·漢隸拾遺》中，有〈三公山碑〉條，<sup>54</sup> 記為「念孫案」，然其中並無論及「序」字之形變。然則此條應是王引之一己之見。

#### 7、〈無望〉（頁 1026）

「以天為法，以德為行，以道為宗，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，精充天地而不竭，神覆宇宙而無望。」高注曰：「無望，無界畔也。」引之曰：「正文及注內兩『望』字，皆埒字之誤。《淮南·原道》篇云：『知八紘九野之形埒。』是埒為界畔之名；故高云：『無埒，無界畔也。』若作『望』，則與界畔之義無涉，且宗、窮為韻，竭、埒為韻。若作『望』則失其韻矣。」

根祥案：許維通《集釋》謂為「王引之曰」<sup>55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今考《讀書雜誌》中並無其他相關論述，則此條當為王引之所得。

#### 8、〈愁慮〉（頁 1027）

〈察微〉篇「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」。高注曰：「積累其仁心，思慮其善政，以求至治也。」引之曰：「高姐愁慮二字之義未明。愁讀為拏；拏，聚也。積心拏慮，其義一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『拏，聚也。』《說文》曰：『黹，收束也；或作拏。』又曰：『拏，束也。』引《商頌·長發》篇『百祿是拏』，今《詩》作『道』。《毛傳》曰：『道，聚也。』〈鄉飲酒義〉『秋之為言愁也，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。』鄭注曰：『愁讀為拏；拏，斂也。』《漢書·律厯志》曰：『秋，黹也，物黹斂乃成熟。』黹、拏、愁、道古同聲而通用。」

根祥案：許維通《集釋》謂為「王引之曰」<sup>56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此條不見於其他文獻中，故不可知其情狀也。

#### 9、〈煤室〉（頁 1027）

〈任數〉篇「嚮者煤室入甌中」。高注曰：「煤室，煙塵也。」《文選》陸機〈君子行〉注引此「煤室」作「𤇀煤」。又引高注：「𤇀煤，煙塵也。」𤇀讀作臺。《家語·在厄》篇「𤇀煤」作「𤇀墨」。《說文》：「𤇀，灰𤇀煤也。」《一切經音義》十五引《通俗文》云：「積煙為𤇀煤。」引之曰：「煤室當作臺煤，臺與室字形相似，而誤。蓋正文借臺為

<sup>53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十三〈孝行〉，頁 3。

<sup>54</sup> 王念孫著：《讀書雜誌》，志十，頁 1-2，總頁 984-985。

<sup>55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十三〈下賢〉，頁 15。

<sup>56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十三〈察微〉，頁 21。

𤇑，而注獨台為𤇑也。今本臺煤二字誤倒，臺字又訛作室，而注內復有脫文。《文選》注所引『𤇑煤』亦當作臺煤；其引高注『𤇑讀作臺』，當是『臺讀作𤇑』。今本《文選》亦後人所改。𤇑為正字，臺為借字，故云『臺讀作𤇑』，若云『𤇑讀作臺』則是反以假借字易正字，不可通矣。畢校本據文選注改『煤室』為『煤𤇑』，非也。𤇑與室形聲俱不相近，若本是𤇑字，無緣誤為室。且《文選》注及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一切經音義》皆作『𤇑煤』，非作『煤𤇑』也。

根祥案：許維通《集釋》謂為「王引之曰」<sup>57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王氏其他著作中未見有相關之論述。

#### 10、〈子姪〉（頁 1029）

〈疑似〉篇「梁北有黎邱部，有奇鬼焉，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。」《太平御覽·神鬼部三》引此子姪作子姪姪。《文選·思元賦》注引作「子姪」。引之曰：「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，男子則否。子姪本作子姪，姪與姪草書相似，故姪訛為姪。《漢書·田蚡》傳『跪起如子姪』，《史記》訛作『子姪』，是其證也。《御覽》作『子姪姪』者，後人據誤本。《呂氏春秋》旁記『姪』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。《文選》注作『子姪』，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。古者謂子孫曰姪，或曰子姪。〈特牲饋食禮〉曰：『子姪兄弟如主人之服。』鄭注曰：『所祭者之子孫；言子姪者，子之所生。』〈曲禮〉曰：『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。』鄭注曰：『姪之言生也，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，廣子姪也。』〈玉藻〉曰：『縞冠元武，子姪之冠也。』注曰：『為父有喪服，子為之不純吉也。』〈喪大記〉曰：『卿大夫父兄子姪立于東方』，注曰：『子姪為眾子孫也。』姪之言生也。〈楚語〉曰：『帥其子姪，從其時享。』〈越語〉曰：『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姪。』《列子·說符》篇曰：『秦穆公謂伯樂曰：「子之年長矣，子姪有可使求馬者乎？」伯樂對曰：「臣之子皆下才也。」』《韓子·八經》篇曰：『亂之所生者六也：主母、后姪、子姪、弟兄、大臣、顯賢。』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曰：『既驩合矣，或不能成子姪。』」

根祥案：許維通《集釋》謂為「王引之曰」<sup>58</sup>，與《讀書雜誌》同。考《讀書雜誌·史記第五》下，亦有「子姪」一條，<sup>59</sup> 記為「引之曰」，而其論證內容與《呂氏春秋雜誌》相同而較簡省，文末曰「說見《呂氏春秋》『子姪』下」。則可見此條可能乃王引之所研究而得者也。

以上詳考許維通所謂記為王引之曰者十條，許氏《呂氏春秋集釋》中亦一皆記為「王引之曰」，並無例外。且其中第五條、第十條亦見於《讀書雜誌》他處，仍記為「引之曰」，第六條可見不出於王念孫。第二條明顯借用王念孫之論證，第三條部分運用王念孫之學說，第一條從第三條間接相關。第四、七、八、九共四條則無可考。凡此與許氏所云「《呂氏春秋雜誌》計

<sup>57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十七〈任數〉，頁 15。

<sup>58</sup> 許維通撰：《呂氏春秋集釋》卷十七〈疑似〉，頁 8。

<sup>59</sup> 王念孫著：《讀書雜誌》，志三之五，頁 32，總頁 151。



引伯申十條，今覆按底本，有七條為石渠所校」並不相合。假若許氏既見十條中七條為石臞所校，則何以《集釋》中未之或引述一二？退而論之，七條原出於石臞所校得者，其稿本所論述，必不如今本《呂氏春秋雜誌》中「引之曰」所論證之詳且精，故捨「念孫案」而用「引之曰」也。夫如是，則王引之於其父之學說，實亦曾加用力，有增補編纂之功在焉，未可據許氏之言而遽以論定所謂「竊掩」與「託美」之說也。

## （二）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與相關文獻對比研究

筆者既獲陳鴻森先生惠賜大文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，拜讀再三；又購得李宗焄所著《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一書，披閱審思，進而得知中研院所藏王念孫論經義函手稿（即前述當更題為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），實為付寄李惇之書信；於是比觀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與李惇所著《群經識小》，因而赫然發現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中所論二十條經義，竟有十四條載錄於《群經識小》之中，較之李宗焄所數見於《經義述聞》者九條（其實不止九條，詳見下文），猶有過之。此一關係現象，正可據此以論王念孫論經義之說，其智慧財產權究為誰屬之一助；究為王念孫託名歸美於李惇乎？抑或李惇竊掩王石臞學說而據為己有乎？又〈付李惇書〉與《群經識小》、《經義述聞》三者之間，其關係如何？至於此書信抄寫之時間問題，亦可以從中求得更精確之答案。

以下分條比較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、李惇《群經識小》以及王氏父子《經義述聞》三者間之關係，及其演變、推闡之跡。

第一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	<p>《易·需·象傳》「行」與「常」為韻，「中」與「終」為韻，「外」與「敗」為韻，「聽」與「正」為韻，末云「不速之客來，敬之終吉，雖不當位，未大失也」無韻。謹按：「敬之終吉」下當有「也」字，而以「吉」與「失」為韻。〈象傳〉有先述爻辭而後釋其義者，若此卦及〈歸妹〉卦之「帝乙歸妹，不如其娣之袂良也。其位在中，以貴行也」之類是也。有直述爻辭而不釋其義者，若〈比〉卦之「比之初六，有他吉也」、〈大有〉卦之「大有上吉，自天祐也」之類是也。又〈象傳〉多以「吉」與「失」為韻，若〈訟〉之「從上吉也」與「不失也」為韻、〈比〉之「有他吉也」與「不自失也」為韻、〈小畜〉之「其義吉也」與「亦不自失也」為韻皆是。〈象傳〉無不用韻者，亦無連三句不用「也」字者，且「不速之客來，敬之終吉也」，「也」字頓住，然後可承之曰「雖不當位，未大失也」。〈困·象傳〉之「來徐徐，志在下也，雖不當位，有與也」、〈未濟·象傳〉之「濡其尾，無攸利不續終也。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」是其證。〈隨·象傳〉「從正吉也」，亦與「不失也」為韻，須補入。案頭無《易經》，恐引經文訛誤，須正之。</p>

考李惇《群經識小》卷一易下有〈脫字〉條，<sup>60</sup> 其中文句幾與之全同，文中並按王念孫信中附言所囑，將「〈隨〉卦之「從正吉也」與「不失也」為韻」一例，加入正文之中。而王念孫雖云「案頭無《易經》，恐引經文訛誤，須正之」，然對比結果，王氏所引用相關經文，竟無一字

<sup>60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卷一，總頁13009。

錯漏，可見石臞於經典記憶之深，涵泳之熟，於此窺見一斑。

阮元所刻《皇清經解》本之《群經識小》，於文本時有所刪改。其中以刪去李惇文中提及此說乃出於王念孫之說明語句，為尤甚者。考之李惇之子李紫培於道光五年（1825）春三月，重刻其父《群經識小》一書。書前有王念孫所為序，序於道光六年（1826）八月八日，時石臞已年八十有三。亦有阮元撰〈孝臣李先生傳〉一文。<sup>61</sup>《群經識小》一書，李惇生前曾於乾隆丙申（四十一，1776）手訂付梓，本為五卷；及後李紫培收集其父遺文，再加補訂。於是書前首五卷，為乃翁手訂說經之初本，復以附錄二卷、補遺一卷，共成八卷；而仍題原署曰《群經識小》。<sup>62</sup>

阮元《皇清經解》本《識小》於是條並無說明論說所來自，而李紫培刻本識小中，則明言曰「余友王懷祖曰：吉下當有「也」字。……此說誠是。余（李惇）案：『不速之客……』」。是以如唯據《經解》本參校，則必以為李惇「竊掩」石臞之說以為己有矣。如此誤導後人，誣前人以罪，實不可以為訓。抑或當時學界之間，相觀而善，切磋討論，唯是是求，而不問其所來；是以阮元省略其言，而歸之於李惇者歟！

李宗焜書中於是條下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『不速之客來，敬之終吉』，第二卷 15 頁。」考之《經義述聞》之文，亦與石臞所論大體無異，而仍稱「家大人曰」。引之就文段中文獻證據，整理歸類，分為二證，並補充新證三條：「〈象傳〉稱述經文，即以為韻者，其韻下皆有也字」；「〈大有·象傳〉「大有初九，無交害也」，「〈訟·象傳〉「不克訟，歸而逋也；自下訟上，患至掇也」。文末並指出唐石經已脫「也」字。而所補充之證據，究為王引之所得，抑或王石臞後獲，則無可考矣。而文中既稱「家大人曰」，則是本其所自，無有掠美之心。

第二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<p>〈比·象傳〉「比，吉也」，《本義》以為衍文。謹按：三字中但衍「也」字，其「比吉」二字則當在「原筮」一節之上，其文云「比，吉。原筮原（元）永貞無咎，以剛中也」。若云「需，有孚，光亨，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」、「訟，有孚窒，惕中吉，剛來而得中也」之類，《易》內皆然，不可枚舉。且「以剛中也」四字，正言其吉，則「比吉」二字之非衍文明甚。〈井·象傳〉「養而不窮也」五字亦當在「乃以剛中也」之下，上當有「無喪無得，往來井井」八字。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考李惇《群經識小》卷一〈易〉下，有〈衍文〉條，<sup>63</sup> 其中後段錄有與王念孫所論相同之說，而文字稍有參差。《識小》是條前有文曰：

〈象傳〉釋經雖有定例，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。如〈同人〉卦既釋卦名，又加「同人曰」三字。孔疏謂「猶言同人卦曰者」是也。〈賁〉卦「賁亨」二字，先述其文「柔來」二句，後釋其義。〈漸〉卦「漸之進也」，加一「之」字，所以別於〈晉〉卦。〈既濟〉卦釋曰「小者亨也」，則經文「亨小」，「小」字可不必覆述矣。先儒既疑為衍文、脫文，似非。

<sup>61</sup> 此文於阮元《學經堂文集》亦有之。

<sup>62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續修四庫全書本，第 173 冊），書前〈凡例〉。

<sup>63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 19 冊）卷一，總頁 13008-9。

以上之文，與王念孫所言無甚直接關係。其下文始論〈比·彖傳〉，則用王念孫之例證，於文字則加詳焉。其言曰：

惟〈比〉卦先曰「比，吉也」，後曰「比，輔也，下順從也」，此實錯誤。然《本義》疑「比吉也」三字為衍文。孔疏謂「比，輔也」者，釋比所以得吉。《語類》謂「當云『比，吉；比，輔也；下順從也』」，於義例皆未愜當。

此段相當於石臚手稿所言「〈比·彖傳〉「比，吉也」，《本義》以為衍文」之內容，而復加補充、說明，語句前後亦有置換爾。其文曰：

謹按：〈彖傳〉皆先釋卦名，後釋卦辭。「比吉也」三字止衍「也」字，「比吉」二字當在「原筮」一節之上，其文云「比，輔也，下順從也；比，吉；原筮元永貞无咎，以剛中也」。「以剛中也」四字，正言其吉。〈需·彖傳〉云「需，有孚，光亨，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」、〈訟·彖傳〉云「訟，有孚窒，惕中吉，剛來而得中也」，正與此文法相類。竊疑傳錄者誤置「比吉」二字於「比輔也」之上，後人更誤加「也」字耳。

李惇置「以剛中也」四字，正言其吉，於前文中，與石臚有異。且石臚旁注之「〈井·彖傳〉「養而不窮也」五字亦當在「乃以剛中也」之下，上當有「無喪無得，往來井井」八字」一段，李惇並未採納。

此段李惇未言〈比·彖傳〉一例乃取於石臚。蓋其前後之文仍多李氏之見，王氏所舉例僅其一證耳，故以己言出之。

李宗焄書中此條下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〈比，吉也〉，第二卷5頁。第41、42頁」考王引之此條，稱「家大人曰」，其標題亦與石臚相似，而與李惇不同。其文句蓋據父說而條理分析為四證。其言曰：

家大人曰：「比，吉也」，「也」字涉下文「比，輔也」而衍，其「比吉」二字，則當在下文「原筮」之上，不當在「比輔也」之上；請以四證明之：凡〈彖〉傳，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，若「比吉」二字在「比輔也」之上，則是先列卦辭而後釋卦名，六十四卦皆無此例，一也。凡傳釋卦辭，必列卦名於其上；若〈蒙·彖傳〉曰「蒙亨，以亨行時中也」，〈需·彖傳〉曰「需有孚，光亨，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」，厥類甚多，不可枚舉。然則此亦當云「比吉原筮，元永貞，无咎，以剛中也」，若無「比吉」二字，則自亂其例，二也。九五以剛處中，所以比而得吉，然則以剛中也，正釋「比吉」之義，原筮元永貞之上，必當有比吉二字，三也。《祭統》曰「身比焉順也」，《管子·五輔》篇曰「為人弟者，比順以敬」，是比與順同義。昭二十八年《左傳》曰「擇善而從曰比」，是比與從同義。《荀子·王制》篇曰「天下莫不順比從服」，是比與順從同義。然則「下順從也」，仍是釋比字之義（謂「比輔也」之比），非釋吉字之義，以上文原無比吉二字故也，四也。

其中第一證云「凡彖傳，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」句，與李惇之言相同，而不見於石臚手稿；

而全文亦無石臞「〈井·彖傳〉」之例，此亦與《識小》一致。可見王引之編纂此條時，可能參校《群經識小》之說。又述聞第四證引換言之《祭統》、《管子·五輔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荀子·王制》以證，皆不見於手稿與《識小》中，或為石臞所補，抑或伯申所加，不可知也。總言之，《經義述聞》此條乃合石臞父子及李惇之說而成，而其原創則當歸石臞也。

第三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《書·益稷》「笙鏞以間」。注疏及監本皆不在案頭，須考。謹按：東方鍾磬謂之笙，西方鍾磬謂之鏞。二者迭奏，故云「間」；若〈禮器〉云：「廟堂之下，縣鼓在西，應鼓在東。」又云：「樂交應乎下」是也。《周禮·眡瞭》「擊頌磬笙磬」，鄭注云：「磬在東方曰笙，笙，生也；在西方曰頌，頌或作庸，庸，功也。」此條犯某公諱，故刪。

此條王念孫於末尾注謂「此條犯某公諱，故刪」，又用筆加以鉤剔，以示刪除；故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中未有載錄，蓋石臞所諱者，伯申以諱之。

然王氏父子所諱者，於李惇則可以無視之，故《群經識小》中有〈笙頌〉一條，<sup>64</sup> 即是論「笙鏞以間」者。其言曰：

今《孔傳》云：「鏞，大鐘；間，迭也；吹笙擊鐘。」《蔡傳》因之。又引葉氏之說，謂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，與歌相應者曰頌鐘；頌或謂之鏞，頌鐘即鏞鐘也。上言「以詠」，此言「以間」，相對而言，蓋與詠歌迭奏也。又引〈鄉飲酒〉禮「歌〈鹿鳴〉」、「笙〈南陔〉」、「間歌〈魚麗〉，笙〈由庚〉」為證。蓋以笙與鐘對言，而以堂上、堂下間歌釋間字，殊欠分明。謹按：《周禮·眡瞭》「擊頌磬笙磬」，鄭注云：「磬在東方曰笙，；在西方曰頌」；《儀禮·大射》注云：「笙猶生也，東為陽中，萬物以生。告成功曰頌，西為陰中，萬物之所成。」葉氏「與笙相應，與歌相應」之說，非也。其以鏞為頌鐘，亦未是。下管以下，皆言堂下之樂；堂下間縣，東方鐘磬謂之笙鐘、笙磬，西方鐘磬謂之頌鐘、頌磬。二者迭奏，故云「間」；若〈禮器〉云：「縣鼓在西，應鼓在東。」又云：「樂交應乎下」是也。頌自古音容；詩大序曰：「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」是也。蓋「笙頌」二字以音近而誤為鏞，則鏞字即當作頌字，不得以大鐘當之，亦不得專指頌鐘也。笙字亦該鐘磬二者，不得以列管匏中之笙當之也。

此段文字前半，乃依石臞所說，考「注疏及監本」而錄入。中段「謹案」以下，即本之於石臞之說，而增入《儀禮·大射》、「葉氏」之論。末段自「頌自古音容」以下，為李惇推衍石臞論點而更為之說，以為「笙鏞」即「笙頌」，「笙」指東方之笙鐘、笙磬，「頌」指西方之頌鐘、頌磬；並謂「鏞字即當作頌字，不得以大鐘當之」，其說與石臞有別。或以此而未言此說之源於王念孫也。

<sup>64</sup> 李惇著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卷七二〇，頁13012-3。

第四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《書·洪範》「于其無好德」，「德」字蓋因上節「予攸好德」而行。此條須查《史記·宋世家》注補入，《史記》適不在案頭，故無從辨證。

考《群經識小》卷三〈義文〉條，<sup>65</sup> 即論及此。李惇曰：

〈洪範〉「于其無好德」，【蔡傳云：「於其無好德之人。」謹案：《史記·微子世家》載此書無「德」字。《集解》引鄭康成注「無好于女家之人，雖賜之以爵祿，其動作為汝用惡」，觀此則知鄭所傳古文元無「德」字，與《史記》同也。蓋是節「昌」字與上「明」字為韻，「穀」字與「家、辜」字為韻，「好」字與「咎」字為韻；音義兩合，理無可疑。後人誤衍】「德」字者，蓋因上節「予攸好德」【之文】而【誤耳】

石臞之說，乃倉卒抄錄而成，故僅提示其關鍵而未及論證，是以旁注「須查《史記·宋世家》注補入」。李惇即按王念孫之意，補入《史記·微子世家》并鄭注。而李惇更有思及蔡沈《書集傳》之說，復加以「用韻」為據，以論「德」字之為衍文，證成王氏之說，使之「音義兩合，理無可疑」也。據李紫培刻本《群經識小》，文中明言此說出於「王懷祖」，而《皇清經解》本刪去之。

李宗焜書中標示此條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〈于其無好德〉，第三卷 45 頁。」<sup>66</sup> 考《經義述聞》此條明稱「家大人曰」，基本論點與石臞說同。其後則論自《孔傳》至《蔡傳》諸本，「德」字之漸衍過程及所以致誤之由，則為手稿所無。末段云「且好與咎古音正協。〈皇極〉一篇皆用韻之文，不應此三句獨無韻」，此一論述與李惇同，而其論及蔡傳亦與《識小》相似。蓋或參考李惇之文也。<sup>67</sup>

第五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顧氏炎武言《詩》有半句為韻者，「有瀾濟盈，有鷺雉鳴」，「瀾」與「鷺」為韻，「盈」與「鳴」為韻。常以其類推之，「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」，「蕭」與「悠」為韻，「鳴」與「旌」為韻；「蕭」古讀若「修」，《詩》曰：「彼采蕭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」，又曰：「冽彼下泉，浸彼苞蕭。愔我寤歎，念彼京周」是也。「噲噲其正，嘒嘒其冥」，「噲」與「嘒」為韻，「正」與「冥」為韻。「葦葦萋萋，離離嗃嗃」，「葦」與「離」為韻，「萋」與「嗃」為韻。「乃場乃疆，乃積乃倉」，「場」與「積」為韻，「疆」與「倉」為韻。《易·歸妹·上六》「女承筐無實，士刲羊無血」，「筐」與「羊」為韻，「實」與「血」為韻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「左之右之，坐之起之」，「右」古音「以」，「左」與「坐」為韻，「右」與「起」為韻，亦其類也。

考李惇《群經識小》卷三有〈半句為韻〉條，<sup>68</sup> 其內容所錄與手稿全同，僅將部分文句變作雙

<sup>65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 19 冊）卷七二〇，頁 13017。

<sup>66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三，88 頁。

<sup>67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，在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定稿，《述聞》則初版在嘉慶二年（1797）。

<sup>68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 19 冊）卷七二〇，頁 13024。

行小字註解形式爾；然未明言出於王念孫所言也。

李宗焜書以爲此條不見載於《經義述聞》。細考之，其實不然。蓋此條之所有內容，均見載於《述聞》中，唯其條目不顯爾。查閱《經義述聞》卷七，《詩經下》，有〈古詩隨處有韻〉條，<sup>69</sup> 此條相關之全部論述舉例皆在焉。《述聞》曰：

**家大人曰：**詩序曰「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……記曰：『聲相應故生變，變成方謂之音。』」夫聲與聲之相應，若水之從水，火之從火；其在詩之中，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。故古人之詩，隨處可以用韻，非但用之句末，如後人作五、七言之例已也。……後之誦詩者，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，遂至失其音節。加以時有古今，音有變革，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，則其韻之在句末者，已不能通，其他更無論已。余潛心有年，於古韻既得其要領，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，覺古人之詩，應律合節，觸處成韻，有非後人誦讀之所能盡者。如：……「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」，「蕭」「悠」為韻〔「蕭」古讀若「修」〕，「鳴」「旌」為韻；……「噲噲其正，嘒嘒其冥」，「噲」「嘒」為韻，「正」「冥」為韻。……「乃場乃疆，乃積乃倉」，「場」「積」為韻，「疆」「倉」為韻。……「有漣濟盈，有鷺雉鳴；濟盈不濡軌，雉鳴求其牡」，「漣」「鷺」為韻，〔「鷺」古讀若「諾」之唯〕，「濟」「雉」為韻，「盈」「鳴」為韻，「軌」「牡」為韻。……，「萋萋萋萋，雝雝喈喈」……，「萋」「雝」為韻，「萋」「喈」為韻。……皆本句中自為一韻，蓋其屬辭之工，比音之密如此。……譬之風行水上，自然成文，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。昔之歌詩者莫不知之，而今日遂成絕響。若加以音釋，則學者必苦其繁碎；故於《詩補韻》不載而別記於此。又其字之不見於句末者，如趯、如鷺、如汎、如彼、如髧、如念、如滌、如厭、如踟、如怒、如哆、如侈、如琢，觀此皆可以得其本音。……其群經及《楚辭》之韻，亦有不在句末者，如：……《歸妹·上六》「女承筐，無實；士刲羊，無血」，「筐」「羊」為韻，「實」「血」為韻。……〈郊特牲〉「左之右之，坐之起之」，「左」「坐」為韻，「右」「起」為韻〔「右」古音「矣」〕，……皆本句中字為一韻，蓋古人用韻，往往如此。若周秦諸子書，則遽數之不能終也。

李宗焜此條未察，以爲不見於《經義述聞》中。而陳鴻森先生大文中已經指出云：「另第五條論詩韻者，亦略見於《述聞》卷七〈古詩隨處有韻〉條中。雖文字有繁略之別，蓋此猶其未定之稿耳。」<sup>70</sup> 此條仍稱「家大人曰」，其中論《詩經》用韻處極多，比之手稿所錄逾近四倍，可見王念孫終身勤於研究經義，有所得則抄錄之，因成〈古詩隨處有韻〉條。陳鴻森先生之言可信。

王念孫於《群經識小》序中，敘明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中，採錄李惇之說兩條：一是〈子孫其逢〉，一是〈濟盈不濡軌〉。而《經義述聞》此兩條確特記「李成裕」之名，可見皆爲李惇所創獲者。而李氏《識小》又有〈軌、牡爲韻〉條，<sup>71</sup> 亦用「軌」「牡」爲韻爲其論證之一。

<sup>69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七，頁179。

<sup>70</sup> 陳鴻森撰：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，頁451。

<sup>71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卷七二六，頁P13053。此條即《經義述聞》〈濟盈不

其言曰：

《釋文》云：「軌舊龜美反，謂車轄頭也。依傳意宜音犯。案：《說文》云：『軌，車轍也；從車九聲。龜美反。』『軌，車軾前也；從車凡聲。』音犯。車轄頭所謂軻也。相亂，故具論之。」謹案：《毛傳》云：「由軻以上為軌。」陸所謂「依傳意宜音犯也」。又引《說文》以為軌是轍跡，不可言濡，軻是軾前。又云：「車轄頭所謂軻也，相亂，故具論之」。其說未明，不知軌字自有二義：《說文》訓為轍跡者，〈中庸〉「車同軌」是也。若〈少儀〉「左執轡，又執爵，祭左右軌范，乃飲」，軌范並言，則顯然兩物矣。下注云：「軌謂轄頭也。《周禮大馭》「祭兩軻，祭軌，乃飲。」軌與軻同謂轄頭也。合兩處觀之，蓋記之左右軌與大馭之兩軻，皆謂車轄頭也。轄頭在軌之下，車之濟盈，必濡其轄頭，不必作軌也。且以古音言之，軌，居酉反；牡，莫九反。此節瀾驚、盈鳴、軌牡，用韻甚密；若軌字從軻，則走矣，無是理也。此處訓詁當用鄭車轄頭之說為確。《集傳》讀軌作九音，最是，但訓軌為轍，轍乃是車之跡，非車尚可指之物，則不可以言濡矣。

此章與《經義述聞》卷五〈濟盈不濡軌〉條<sup>72</sup>所載，自「家大人曰」以下，引「李成裕曰」，至末有「成裕此說，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」一段，文字幾乎全同，唯述聞引文略多而已。《識小》此〈軌、牡為韻〉條，載於卷八〈補遺〉中，可見乃李紫培蒐羅遺文而得。筆者以為此條乃紫培從《述聞》中錄出，補入《識小》之中，故兩者文字幾乎一致。

《述聞》此條引李成裕說後，有王念孫案語曰：「……陸德明、孔穎達所見本，軸自始誤作軻，軌上又脫濡字，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為水所濡之度，而誤以為釋軌之名物，又以軌非軻上之物，而疑為軾前之軌。唐石經因之，遂改軌為軻；則既失其義，而又失其韻矣。……」此段案語乃補李惇辨說之不足，亦謂「失義、失韻」，與李惇說同；可見「瀾驚、盈鳴、軌牡，用韻甚密」之說，或為李惇所倡，王念孫復加發揮，遂後來居上，蔚成大義也。

第六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<p>《鄭·羔裘》首章「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」。謹按「舍」即「釋」字也，古舍、釋字通，《管子》引此作「澤命不渝」。（鈞除）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此條論《詩經》訓詁，為石臞所鈎剔刪除，今亦不見載於《群經識小》及《經義述聞》之中。然考之戴震《毛鄭詩考證》，有論云：

《鄭風·羔裘》首章「舍命不渝」，箋云：「舍猶處也。」震按：古字舍、釋通。《禮記》「舍菜」即「釋菜」是也。又澤，釋亦通。〈考工記〉「水有時以凝，有時以澤」，謂凝冰復釋。故李軌音「釋」是也。《管子》引此詩作「澤命不渝」，澤與舍義並為「釋」，

濡軌〉條所引用之內容。

<sup>72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五，頁125。

言自受命於君，以至復命而後釋，終始如一也。<sup>73</sup>

段玉裁《詩經小學》亦曰：「舍命不渝：《管子》『澤命不渝』，澤即釋，釋即舍也。」<sup>74</sup> 段玉裁與王念孫俱為戴氏門人，同聞師說，故各有所記也。此條原為戴東原之說，石臞不敢掠美，或因此而鉤除之爾。李惇與石臞為論學至交，當亦尊其師說而未之載錄也。

第七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〈澗酌〉三章「可以濯漑」，《毛傳》云：「漑，清也。」謹按：上章「可以濯壘」，壘，尊名也，漑亦當為尊名。《周禮·鬯人》：「凡祭祀社壇用大壘，榮門用瓢，齋廟用脩；凡山川四方用蜃，凡裸事用概，凡副事用散。」鄭注云：「脩、蜃、概、散，皆漆尊也。概，尊以朱帶者。」賈疏云：「黑漆為尊，以朱帶落腹，故名概。概者橫概之義。」然則「社壇用壘，裸事用概」，壘、概皆尊名也，故云「可以濯壘」、「可以濯漑」。漑、概古字通，《周禮·大宗伯》，注「漑，祭器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漑本或作概。」

考《群經識小》卷三〈詩經〉中有〈濯漑〉條，<sup>75</sup> 即載錄此條也。文字大體相同，唯《經解》本與李紫培刻本稍有差異：李刻本有言此條出於「王懷祖」，並推崇「實為確解」，而阮刻《經解》本刪之。又阮刻本語句稍有挪移而已。

李宗焜書中於此條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〈可以濯漑〉，第七卷2頁。」考《經義述聞》所述亦無大異，唯稱「家大人曰」，並補上《史記范睢傳》、《周禮·天官·世婦》之資料爾。

第八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許氏《說文》「𠂔」字注云：「讀若三年導服之導。」導即禫字也。《儀禮·士虞禮》：「中月而禫」，鄭注云：「古文禫或為導。」《禮記·喪大記》：「禫而內無哭者」，鄭注云：「禫或皆作道。」是古禫、導字通，而近世字書皆未考也。

考《群經識小》中有〈禫或為導〉條，<sup>76</sup> 內容全同而文字稍異爾。《經義述聞》則未之載錄。審夫惠棟《九經古義》卷十中，已有論及。其言曰：

「中月而禫」，注云：「自喪至終，凡二十七月。古文禫或為導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𠂔，古文𠂔。讀若三年導服之導。」<sup>77</sup> 又木部「桺」字下所讀同。<sup>78</sup> 棟案：導服即禫服，从古文，故曰導。則是𠂔與桺皆讀為禫。近有妄人作字書名《正字通》，斥許君說為妄，是未讀《儀禮》。〈喪服記〉云：「禫而內無哭者。」注云：「禫或皆作道。」

惠棟於王念孫為師傅輩，而其論述較之石臞所說，更形精確，幾已成定論。石臞早歲或未之見，

<sup>73</sup> 戴震著：《毛鄭詩考證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6冊），總頁3900。

<sup>74</sup> 段玉裁著：《詩經小學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6冊）卷六三〇，總頁4064。

<sup>75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卷七二一，總頁13023。

<sup>76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卷七二二，總頁13028。

<sup>77</sup> 《說文》原文曰：「𠂔，舌貌。從谷省，象形。𠂔，古文𠂔。讀若三年導服之導。」，頁87。

<sup>78</sup> 《說文》原文：「桺：遯其也；從木炎聲。讀若三年導服之導。」，頁241。



故錄之付李惇，李惇因收入書中。或其後石臞既見惠棟之說，故剔而去之，《經義述聞》因亦未之記述也。

第九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云：「尊讓絜敬也者，君子之所以相接也。君子尊讓則不爭，絜敬則不慢，不慢不爭則遠於門辨矣。不門辨則無暴亂之禍矣，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，故聖人制之以道。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，賓主共之也。尊有元酒，貴其質也。」鄭注讀「故聖人制之以道」為一句，「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」為一句。謹按：鄉飲酒有賓、有主、有介、有僎、有眾賓，而酒者主人所設，則當言「主人尊於房戶之間」，不當言「鄉人士君子{尊於房戶之間(鈎括)}」，且鄉飲酒大夫為主人，則又當言「大夫尊於房戶之間」，不當言「鄉人士{尊於房戶之間(鈎括)}」。自〈冠義〉至〈聘義〉六篇，皆列《儀禮》經文於上，而釋之於下；「尊於房戶之間」，《儀禮》經文也，「賓主共之」，記者釋經也。然則{「鄉人士君子」五字與(旁加)}「尊於房戶之間」{文不相屬，(旁加)}之上不得有「鄉人士君子」五字明矣。竊謂「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」十二字當作一句讀，「故」字結上非起下，「道」猶「道之以德」之「道」；謂聖人制此禮以道鄉人士君子耳。再連上文讀「君子尊讓……，不慢不爭則遠於門辨矣，不門辨則無暴亂之禍矣，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，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」，則其義自明。下文「尊於房戶之間，賓主共之也，尊有元酒，貴其質也」{云云，別釋經文，不與上屬(旁加)}，別為一義，與上無涉。

考《皇清經解》本《群經識小》〈三禮〉卷有〈鄭氏誤讀〉一條，<sup>79</sup> 其內容與手稿幾乎全同。

然其中至不可解者，李紫培刻本《群經識小》中，此條闕如，不見載錄。

李宗焜書中論此條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〉，第十六卷 38 頁。」

《述聞》中稱「家大人曰」，而文句比之手稿則有所簡省而大體亦同，唯文中增入〈樂記〉、〈射義〉為證，文末補論鄭注之非爾。

經對比《經解》本《識小》與《述聞》文字，除《述聞》所簡省者外，兩者相當一致，可見皆出於手稿。其異者在《經解》本全依手稿，於手稿中旁加之字句，多不採用；而《述聞》則對《手稿》有所剪裁去取，且多採用旁加之字句。

細考手稿文句，其最末文句「下文『尊於房戶之間，賓主共之也。尊有玄酒，貴其質也』【旁注：云云，別釋經文，不與上屬】，別為一義，與上無涉。」其中旁注之「別釋經文，不與上屬」，與下文「別為一義，與上無涉」，兩節意義互相重複，顯然兩者取一即可，文義已足。可知王念孫原本意欲以旁加文句取代原句，然而於原句未加刪劃，似欲兩存之。而《識小》用原句作「『尊有玄酒，貴其質也』，別為一義，與上無涉。」《述聞》用旁加改後句作「下文『尊於房戶之間，賓主共之也』，別釋經文，不與上屬。」顯然即取其一，其義自足。相同情況亦見於「然則【旁注：『鄉人士君子』五字與】『尊於房戶之間』【旁注：文不相屬】之上不得有

<sup>79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 19 冊）卷七二二，總頁 13033。

『鄉人士君子』五字明矣。」《述聞》用旁注之句作「然則『鄉人士君子』五字與『尊於房戶之間』，文不相屬。」而止；《識小》則用原文作「然則『尊於房戶之間』之上，不得有『鄉人士君子』五字明矣。」

前述李培紫刻《識小》無此則，阮元《皇清經解》本則有之。考李培紫刻本成於道光五年，謂前五卷乃據其父論經初本，今書中無此段文字，其因李惇初刻本即未收錄此條歟？抑李惇初刻本有之，而紫培重刻之際，有所遺漏歟？審夫如此一大段文句，若謂李培紫漏刻，實難理解，此說不可通。尚有一說，以為手稿二十條論經義文字，唯此條改動最甚，鈎乙紛紜，增刪不定；或即因此而李惇初刻本未採用此條歟？

阮刻《皇清經解》本成於道光九年秋。阮元刻本既有此條，顯然阮元似既知此則與其他條文，乃同出於王氏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者，否則何據而補入之！如此則可推知阮元或曾見此函，亦知李惇諸說乃出於王念孫書函，故為之補入也。今《經解》本《群經識小》中此段文字與手稿幾乎全同；阮元刻《經解》時，《經義述聞》二版已刊行，而《識小》所補不與《述聞》同，可見乃據手稿補之也。

第十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	《論語》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」，漢石經無「流」字。謹按：「流」字衍文，當從石經作「惡居下而訕上者」。「居下」以位言也，「居下流」則非以位言矣。蓋因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」而誤衍耳。《漢書·朱雲傳》云：「小臣居下訕上」，用《論語》文也。

考之《群經識小》與《經義述聞》，皆未載錄此條。而此條乃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中，唯一議論《論語》者。檢閱《群經識小》卷六〈附錄〉，所論皆為《論語》之義，其中亦未見載。而《經義述聞》三十二卷之中，本即無議《論語》之篇卷。而手稿中出現此條議《論語》之文，其中實有關鍵之處。

然則王氏父子所著《經義述聞》，何以於《論語》一經，無所論述？此誠可以探討者也。今觀夫王念孫為其父王安國撰之〈春圃府君行狀〉<sup>80</sup>，其文曰：

府君……年十九，見知於銅仁張公，補博士弟子員第一，乃潛心理學，不沾沾於帖括也。……府君通學舍為西齋，每考校取子弟之秀者置其中，共三、四十人；暇日則與朝夕講學，如塾師然。為諸生批定《四子書大全》，折衷眾說，多所論定。……嘗欲編輯《四子書大全》，曰：「朱子《集註章句》，約而精，無可議者；其餘門弟子所彙《語類》、《文集》諸書詳矣，而多未醇。有明以後，說書者愈繁而理愈晦。今欲兼綜朱子師弟問答之語，裒其粹精，以附註後，更折取眾說，一衷以朱子解經之意，嚴為去取，庶條緒不紛，義歸一是，學者不至迷繆。」

是知石臞之父安國，於學最重《四書》，尤尊朱熹之學。晦庵既有《四書章句集注》之力作，

<sup>80</sup> 《羅雪堂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3年六編第19冊），《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》卷三，總頁7495-7508。

是以王安國遵循而不替，以為「無可議者」也。石臞生性至孝，而年十四喪父，故深識其父遺志，由是於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二經，多未肯置喙焉。至於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則因本為《禮記》之篇，故論及之。

由手稿此條議《論語》之文，可知石臞青壯之時，於《論語》亦嘗偶有置疑之論，唯不見刊錄於《經義述聞》專著爾。然則此議《論語》之文，彌足珍貴。

第十一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	<p>《禮記·月令》「鴻雁來」，鄭注云：「今月令鴻皆為候。」正義曰：「今月令者，《呂氏春秋》是也。」謹按：「田獵置罟羅網畢翳」，鄭注云：「今月令無『罟』」，而《呂氏春秋》有「罟」字。「毋悖于時」，鄭注云：「今月令無『于時』」，而《呂氏春秋》有「于時」字。「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」，鄭注云：「今月令『作為』為『詐偽』」，而《呂氏春秋》仍作「作為」。然則所謂「今月令」者，非《呂氏春秋》也。考之「淫雨蚤降」，鄭注云：「今月令曰『眾雨』」《說文》「霰」字注引《明堂月令》曰「霰雨」。「命漁師伐蛟」，鄭注云：「今月令『漁師』為『榜人』」，《說文》「舫」字注引《明堂月令》曰「舫人」，舫、榜聲相近。「固封疆」鄭注云：「今月令『疆』或為『璽』」，蔡邕《獨斷》引《月令》曰「固封璽」，然則「今月令」即「明堂月令」也。蔡邕有《明堂月令章【句】》<sup>81</sup>。</p>

考此條亦見載於李惇《群經識小》〈明堂月令〉條中。<sup>82</sup> 內容大致相同，惟文句有所簡省與前後調整爾。文中以「謹案」立言，亦未說明此條為王念孫所出。

李宗焜書中並未標示此條，當是以為不見於《經義述聞》。筆者經詳加考校，得知《經義述聞》中，實亦有論及此條者。《經義述聞》第十四卷，《禮記》上〈固封疆〉條<sup>83</sup>云：

「孟冬之月，固封疆，備邊竟」，鄭注曰：「今月令疆或為璽」。家大人曰：蔡邕《獨斷》引《月令》曰「固封璽」，即鄭所謂「今月令」也。《呂氏春秋·孟冬》篇、《淮南·時則》篇，亦作「固封璽」。案：《爾雅》曰「疆，邊垂也」，昭元年《穀梁傳》曰「疆之為言猶竟也」，成二年《左傳》注曰「封，竟也」，是封疆即邊竟；既言「固封疆」，又言「備邊竟」，則複矣；當從今月令、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作「固封璽」為是。高注曰：「封璽，印封也。」《周官·司車》「凡通貨賄，以璽節出入之」，鄭彼注曰：「璽節，印章」，如今斗檢封矣，鍵閉、管籥、封璽，事皆關乎啟閉，故連類而及之。「固封璽」以上五句，皆邑中之事；備邊竟以下四句，皆野外之事。

手稿中論「固封璽」，乃以之論證「今月令」為「明堂月令」也。王引之稱「家大人曰」之句，甚類石臞手稿之言，所引《呂氏春秋》，手稿所論及也。王引之此論題，古已或有所知，如《春秋左傳注》《傳》文「璽書追而與之」。孔疏曰：「〈月令〉曰：『固封璽』。按鄭注〈月令〉但有

<sup>81</sup> 李宗焜所釋文句無「句」字，然細察手稿，實有此「句」字。

<sup>82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卷七十二，總頁P13030。

<sup>83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十四，總頁346。

「固封疆」，不見有「固封璽」之文也。但蔡邕在康成前，或所見〈月令〉本異，未可知也。」<sup>84</sup>而伯申所論，不僅在「疆、璽」之異，進而論辨「固封疆」之失，而以「固封璽」爲是也。雖所用資料同而所論標的各異；且伯申如此引而用之，尙且直稱「家大人曰」而未掩有之，可見王引之於乃翁之學說，有述事繼志之功，而無竊據之意。

「固封璽」之文，除伯申所論外，尙見於《逸周書·月令解》：

命百官謹蓋藏；命司徒循行積聚，無有不斂；埒城郭，戒門閭，脩鍵閉，慎關籬，固封璽，備邊境，完要塞，謹關梁，塞蹊徑。<sup>85</sup>

然則「今月令」究爲何物？此一問題，前人亦已有論及之矣。考梁玉繩（？1716-？1792）《瞥記》中，曾詳論其事曰：

鄭注〈月令〉，引〈今月令〉十七條。「今月令者，即呂氏春秋也。」其異文不止此。即以十七條而論，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全。孟春「鴻雁來」，注云：「今月令鴻皆爲候。」而呂做「候雁北」（《淮南子·時則訓》、《易通卦驗》全）則來爲北，不獨鴻爲候也。季春「罝罟羅網畢翳」，注云：「今月令無罟，翳爲弋。而呂作畢弋罝罟羅網。（《淮南》全）是有罟字也。」毋悖干時，毋或作淫巧，注云：「今月令無干時，作爲詐譌。」而呂固有此四字也。「淫雨蚤降」注云：「今月令曰罟雨」，而呂仍作「淫」（《淮南》全），不作罟也。仲夏「處必掩身毋躁」注云：「今月令毋躁爲欲靜」，而呂作「欲靜無躁」也。（畢氏輯校云「又出無躁二字，非本文。《淮南》作「慎身無躁」」「百官靜事毋刑」注云：「今月令刑爲徑。」（《淮南》全）而呂仍作「刑」也。季夏「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鼈」注云：「今月令漁師爲榜人」，而呂仍作「漁師」也。「命四監」注云：「今月令四爲田」，而呂仍作「四」也。（《淮南》全）孟秋「民多瘡疾」注云：「今月令虐卽爲厲疫」，而呂仍作「瘡疾」也。（《淮南》全）孟冬「乘玄路」注云：「今月令曰乘軫路，似當作軫字之誤」，而呂仍作「玄」也。「命太史釁龜策」注云：「今月令曰釁祠，祠，衍字」，而呂作「命太卜禱祠龜策」，無「釁」字也。（《淮南》作「命太祝禱祀神位，占龜策」，亦無「釁」字。）季冬「冰澤腹堅」注云：「今月令無堅」，而呂舊本有「堅」字，畢校本以爲後人所益，刪去，但作「水澤復」，高注或作「複」，不作「腹」也。「及百祀之薪燎」注云：「今月令無」，而呂固有此句也。（《淮南》全）惟孟夏「王瓜生」，「生」爲「菩」（與萑通）。「無休于都」，「休」爲「伏」。季秋「挾矢以獵」，「獵」爲「射」。孟冬「固封疆」，「疆」爲「璽」。鄭注與今呂本合。（《淮南》及《獨斷》、《御覽》六〇八十二引《漢官儀》，並作「固封璽」）案：孔仲達說〈月令〉出有先後，入《禮記》者爲古，不入《禮記》者爲今。據鄭目錄則《禮記·月令》即鈔合《呂氏春秋》十二月紀之首章，並無先後今古之分；仲達之言，殊無所據。又鄭與高謫

<sup>84</sup> 《春秋左傳注》。孔疏卷三十九。

<sup>85</sup> 著者不詳，晉孔晁注：《逸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80年據抱經堂本校刊，四部備要）卷六，頁15。

全時，所見《呂覽》亦不應異全若是。竊疑所謂「今月令」者，乃漢時太史所上月曆，非《呂覽》也。〈《後書·侯霸傳》「每春下寬大之詔，行四時之令，皆霸所建」，是東漢自有所行〈月令〉矣。〉<sup>86</sup>

梁玉繩盡舉《呂氏春秋》與鄭注〈月令〉所列「今月令」之文，比其同異，推論所謂「今月令」者，絕非正義所謂《呂氏春秋》；此論與王石臞所得一致，而其論斷或稍先於石臞也。然梁氏謂「乃漢時太史所上月曆」，則與王氏以為「明堂月令」不同。

復考汪中《經義知新錄》中，有記載王念孫此論題者。其言曰：

〈月令〉鄭注屢云「今月令作某」。王懷祖云：「世以〈今月令〉為《淮南·時則訓》，非也。漢世有〈明堂月令〉，蔡伯喈所撰也。」中按：祭法引〈明堂月令〉曰：「春曰『其帝大皞，其神句芒』；夏曰『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』；中央土曰『其帝黃帝，其神后土』；秋曰『其帝少昊，其神蓐收』；冬曰『其帝顓頊，其神元冥』。」其文與《禮記》同。然則〈月令〉之為〈明堂月令〉，此其證也。<sup>87</sup>

汪中所記王懷祖之言，與手稿中末段相似，皆謂〈今月令〉乃漢代蔡伯喈所撰《明堂月令》也；其不同者，在手稿言或以為《呂氏春秋》，而汪中則謂誤以為《淮南·時則》。根祥按：《禮記》卷十四〈月令〉「鴻鴈來」。鄭注云：「鴈自南方來，將北反其居。〈今月令〉『鴻皆為候』。」疏曰：

按下季冬，鴈北鄉。據其從南始北，正月來至中國，故此云：鴻鴈來。但來有先後，後者二月始來。故〈通卦驗〉二月節云：候鴈北。云：今月令「鴻皆為候」者，但〈月令〉出有先後；入《禮記》者為古，不入《禮記》者為今；則《呂氏春秋》是也。

則見王氏手稿之言為是，汪中或記憶有誤也。又汪中以所言五方帝、神之名，見於《禮記·月令》，遂斷為《禮記·月令》，而非蔡邕所作《明堂月令》。然審閱《淮南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等，皆有類似之言，不必專指為《禮記·月令》也。是以汪中之說不足以辨王懷祖為非。據此汪中所錄，可知王念孫亦嘗以此說質之於汪中，汪中不以為然而復辨之。

#### 第十二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幠、扈，有也。」郭注引《詩》曰：「遂幠大東」，邢疏云：「今《詩》本作『遂荒大東』，此言『遂幠』者，所見本異〔也〕，或當在齊、魯、韓詩。」謹按：荒、幠古字通。《禮記·投壺》「毋幠毋敖」，《大戴禮》作「毋荒毋敖」，幠即荒字，故言幠而不言荒，猶之「初、哉、首、基、肇、祖、元、胎、俶、落、權輿，始也」，哉即載字，故言哉而不言載。

李惇《群經識小》未錄此條。對比手稿與《群經識小》，凡手稿中所論《爾雅》義四條，皆不見於《識小》一書。李惇亦長於名物訓詁之學，今於念孫所錄《爾雅》之說皆無所受，其故難明。

李宗焜書中於此條下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『扈，有也。』第二十六卷，4頁。」按：《經

<sup>86</sup> 梁玉繩著：《瞥記》（臺北：大華印書館，1968年）卷一，頁18-19，總頁35-37。

<sup>87</sup> 汪中：《經義知新錄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8冊），卷八〇一，頁4。

義述聞》〈庖，有也〉條<sup>88</sup>曰：

引之謹案：庖，古讀若蒙。……〈釋言〉曰：「蒙、荒，奄也。」蒙與庖同，**荒與幬同**；故郭引《詩》「遂荒大東」作「遂幬大東」。蒙、庖、幬、荒，皆謂奄有之也。（《魯頌·閟宮》傳「荒，有也」。《說文》「奄，大有餘也」）《太元·元文》「罔者，有之舍也；蒙者，無之主也」。范望曰：「有生於無，無生於有也。」又「罔蒙相極」，范曰：「罔無蒙有，事相極盡。」是蒙為有也。蒙亦庖耳。《廣雅》「櫬，有也」，家大人《疏證》曰：「《說文》『櫬，兼有也；從有龍聲，讀若聾。』《爾雅》『庖，有也』，庖與櫬聲近而義同。」

王引之此條前稱「引之謹案」，而文中直述「**荒與幬同**；故郭引《詩》「遂荒大東」作「遂幬大東」」，以《詩經》文與郭注《爾雅》引《詩》文對比，以見「荒」與「幬」同。而王念孫之功則在用《禮記》、《大戴記》異文以為例證，證成「**荒與幬同**」之論。一在用，一重證，此其異也。王念孫主在證明「荒、幬」相通；而引之則在明乎「庖、蒙、荒、幬」皆為「有」義，兩者重點不同，無關所謂標竊。且伯申引用其父《爾雅疏證》之說，猶加標示，其心意可見。

第十三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《儀禮》「婦執筭棗栗」，鄭注云：「筭竹器有（而）衣者，其形蓋如今之筭筮簠矣。」賈疏云：「如今之筭筮簠者，此舉漢法以況義，但漢法去今已遠，無可知也。」謹按：《說文》「口」字注云「口盧，飯器，以柳為之，象形。」又云：「口，或作筭。」口盧即筭簠也。《說文》又云：「盧，飯器也。」「筭，籊也。」「籊，飯器也。」然則籊即筭，筭即筭簠，急言之則曰筭，徐言之則曰筭簠耳。

考李惇《群經識小》有〈筭筮簠〉條，<sup>89</sup>除以「昏禮」代「儀禮」外，其他一概全同。可見李惇於石臞文義，無有異議。然李惇未標明說義之所出，或有可議。是條所論，亦未見載於《經義述聞》之中，

第十四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苛，姢也。」郭注云：「煩苛者多嫉姢。」謹按：煩苛者多嫉姢，則是嫉姢因於煩苛，非煩苛為嫉姢矣。考《禮記·內則》「疾痛苛癢」，鄭注云：「苛，疥也。」始知姢、疥古字通。今俗人猶謂疥瘡為苛。

一如前述，李惇於《群經識小》中，未錄入此條《爾雅》之義。而《經義述聞》亦未之見。

第十五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〈釋詁〉：「省，善也。」註云：「省，未詳其義。」謹按：《詩》「帝省其山」，箋云：「省，善也。」正義曰：「〈釋詁〉文。」《禮記·大傳》：「大夫士有大事，省於其君」，注云：「省，善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案《爾雅》省訓善」，是其證。

同前條，李惇《群經識小》不錄《爾雅》之論。《經義述聞》亦未見。觀乎王念孫所言，僅說

<sup>88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二六，總頁 619-620。

<sup>89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 19 冊）卷七二二，總頁 13027。

明其現象，謂「省」有訓「善」義，且出於《爾雅·釋詁》；然未能闡明何以「省」訓「善」也。王引之〈經籍纂詁序〉中有論及此曰：

〈新臺〉篇「蓬篠不鮮」，箋訓「鮮」為善。後人不從，而不知《爾雅》「鮮、省」二字，皆訓為善，正是一聲之轉。且下云「蓬篠不殄」，「殄」讀曰「腴」，其義亦為善也。<sup>90</sup>

據此，可見王引之於在朝為官之時，猶尚孜孜于經訓之探研也。王念孫所未能解決「何以省釋為善」，而引之後出而得其論證也。

第十六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<p>《書·洪範》：「身其康彊，子孫其逢吉。」注疏及監本皆不在案頭，祈考入。此條本出足下，不過增成之耳。「子孫其逢」當絕句，《釋文》引馬融云：「逢，大也。」猶言其後必大耳。《禮記·儒行》「衣逢掖之衣」鄭注云：「逢猶大也」，是其證。蓋逢之言豐也，豐亦大也。《禮記·玉藻》「縫齊倍要」，鄭注云：「縫或為逢，或為豐」，是古逢、豐聲同也。凡音逢音豐者，皆可互通。《說文》「𪔐，煮麥也。從麥豐聲，讀若馮。」《周禮·籩人》「𪔐簋」，鄭注云：「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。」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「燧涌原泉」，《漢書》作「逢」。此條足下再增成之可也。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此條前論手稿所寄付者時，已然論析矣，茲再補充一二。手稿中旁記「此條本出足下，不過增成之耳」，又云「此條足下在增成之可也」，可見本條論說，為收信者所創言，石臞乃為補足之，使增成其說爾。

考李惇《群經識小》中確有〈子孫其逢〉一條，<sup>91</sup> 其論曰：

「身其康彊，子孫其逢吉。」先儒「逢吉」二字連讀。謹案：此節通體用韻，當讀至「逢」字絕句，與上文五「從」字，一「同」字音韻正叶；「吉」字另作一句，與下文五「吉」字、二「凶」字體例更合。「逢」訓為大，《釋文》引馬融云：「逢，大也。」猶言其後必大耳。《禮記·儒行》「衣逢掖之衣」，鄭注云：「逢猶大也」，又訓為「豐」，豐亦大也。《禮記·玉藻》「縫齊倍要」，鄭注云：「縫或為逢，或為豐」，是古逢、豐聲義皆同也。

**體例、訓詁、聲音三者皆合，理無可疑。**

比觀手稿與《識小》文句，《識小》前段所言《尚書·洪範》「稽疑」一疇，通體用韻，據韻字所在，可知其義當於「逢」字絕句。此說不見於王氏手稿，蓋手稿既言「增成」，則既已言之者無庸再敘故也。自「『逢』訓為大」以下，至於文末，所持以論證者，同於手稿，唯文句略作調整爾。可見李惇先倡此說，而石臞更為證成，並以相關論證相告，使之增成其說，遂成定論。而李惇唯採王氏逢、豐訓大之說，而未取其「凡音逢音豐者，皆可互通」之例。蓋石臞所舉例，僅可論證「𪔐，讀若馮」，「𪔐，名曰逢」，「燧，作逢」，與李惇所論，無多相涉，是以

<sup>90</sup> 《羅雪堂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3年六編第20冊），《王文簡公文集》卷三，〈經籍纂詁序〉，總頁8163-4。

<sup>91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卷七二一，總頁13018。

未之用也。

李宗焜書中爲此條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『子孫其逢』，第三卷 47 頁。」考《經義述聞》頁 89〈子孫其逢〉條<sup>92</sup>曰：

「女則從，龜從，筮從，鄉士從，庶民從，是之謂大同，身其剛康疆，子孫其逢吉」，傳以「逢吉」連讀，解為遇吉。家大人曰：余友李氏成裕曰：「當讀至『逢』字句絕，與上文五從一同字，音韻正協，吉字別為一句，與下文五吉字、二凶字，體例正合。據傳以此為大吉，下文三從二逆為中吉，二從三逆為小吉，中吉、小吉且言，況大吉乎！」案此說是也，《漢書王莽傳》曰「康疆之占，逢吉之符」，則西漢時已誤以「逢吉」連讀，蓋亦解為遇吉故也；不知逢者，大也；子孫對身言之，逢對康疆言之；故馬融注曰：「逢，大也。」「子孫其逢」，猶言「其後必大」耳。《儒行》「衣逢掖之衣」，鄭注曰：「逢，猶大也。」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篇「其衣逢」，楊倞注曰：「逢，大也」。《楚辭·天問》「眩弟竝淫，危害厥兄，何變化以作詐，後嗣而逢長而乃也」，言何以變詐如此，後嗣乃得逢長也。逢之言豐也，豐亦大也，《玉藻》「縫齊倍要」，鄭注曰「縫或為逢，或為豐」，《淮南·天文》篇「五穀豐昌」，《史記·天官書》豐作逢。是古逢、豐，聲義皆同也，體例、訓詁、音韻三者皆合，理無可疑。

《述聞》前段稱「家大人曰」引「李成裕」說，至「案此說是也」，正與《識小》中李惇所言「以韻」論證「逢字絕句」相同。可見此確為李惇所創言。其以下論據，除引石臚所述外，亦補充「逢吉」連讀始誤於西漢，復加《荀子》、《楚辭》、《淮南》、《史記》等補證，較之手稿，更形充實。而其不用「𣎵，讀若馮」，「𣎵，名曰逢」，「縫，作逢」之例，亦與《識小》同。更有進者，《經義述聞》之末，謂「體例、訓詁、音韻三者皆合，理無可疑」之語，與《識小》如出一轍。由《經義述聞》所載文句，與《群經識小》比觀，可知王引之撰《經義述聞》時，不單承用父說，且兼用《識小》之文。李惇於乾隆四十一年手定《群經識小》版行，王引之始為《經義述聞》不分卷四卷初版時在嘉慶二年，則其撰作之時有所參校，理所當然。

第十七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《禮記·檀弓》：「瓦不成味」，鄭注云：「味當作沫。沫，𣎵也。」釋文：「沫，亡曷反。」謹按：「亡曷反」之音非也。「亡曷反」則音末。《說文》云：「沫，洒面也。」音誨，字從午未之未，或作𣎵，又作𣎵，故鄭注云：「沫，𣎵也。」〈內則〉云：「面垢燂潘請𣎵」，《書·顧命》云：「王乃洮頰水」，《漢書》作「王乃洮沫水」，沫、頰、𣎵同也。味、沫聲相近，故鄭注云「味當作沫」，今音「亡曷反」失之矣。又按：《說文》云：「沫水出蜀西徼外，東南入江。」音末，字從本末之末，與此迥別。《左傳》「曹劌」，《史記》作「曹沫」，沫字亦當音誨，《索隱》讀為末，非也。

<sup>92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二六，總頁 89。



李惇《群經識小》有〈味當作沫〉條。<sup>93</sup> 與手稿內容幾乎全同，而文辭順序稍有參差爾。《皇清經解》本《識小》未言出於王念孫，而李紫培刻本《識小》則標曰「王懷祖曰」；而其下「又案」處，紫培本作「余案」。考李紫培刻本前五卷乃據李惇自訂初刊本而來，則此條當為李惇所志。以此而論之，《說文》以下，或即李惇之見。

又考手稿於第十條與十一條間，有「《左傳》曹劇，《公羊》傳作曹」一句，並經鉤剔刪除；或與本條相關。

李宗焜書中此條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『瓦不成味』，第十四卷 24 頁。」考《述聞》所記，與手稿亦大致相似，稱「家大人曰」以啓端。除加馬融說外，其末不錄《說文》「沫水」及「曹劇」「曹沫」為證，而另以「與涎沫之沫異」以替之，蓋「涎沫」與「沫水」之「沫」同也。以此亦可見《說文》以下，或即李惇之言，故伯申置換之，以成其「一家」之言也。

第十八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<p>《周禮·大司樂》：「凡有道者、有德者使教焉」，鄭注云：「若舜命夔典樂，教育子是也。」今《尚書》作「教胄子」，《說文》「育」字注亦引《虞書》曰「教育子」，然則鄭、許所見本皆作「育」也。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李惇《群經識小》有〈教胄子〉條。<sup>94</sup> 與《述聞》全同，唯引《尚書·堯典》文較詳爾。

李宗焜以為此條未見載於《經義述聞》；然詳考之，《述聞》中引用此一見解而論之者，不止一見。《經義述聞》卷三〈尚書上〉有〈教胄子〉條，<sup>95</sup> 其文曰：

《說文》引作「教育子」。《周官·大司樂》注亦作「教育子」（見《釋文》、《群經音辨》，今本作胄子），《王制》注及《漢書·禮樂志》竝作「教胄子」，《史記·五帝》作「教穉子」，引之謹案：育子，穉子也，育字或作毓，通作鬻，又通作鞠；《邶風·谷風》篇「昔育恐育鞠」，鄭箋解「昔育」曰：「育，稚也」，正義以為《爾雅·釋言》文，今《爾雅》育作鞠，郭璞音義曰：「鞠一作毓」（見《鵲鴉》釋文），《豳風·鵲鴉》篇「鬻子之閔斯」，毛傳曰：「鬻，稚也，稚子成王也。」《釋文》「鬻由六反，徐居六反」，是育、鞠同聲同義，古謂穉子為育子，或曰鞠子；《堯典》之「育子」，即《豳風》之「鬻子」，亦即《康誥》所謂「兄亦不念鞠子哀」，《顧命》所謂「無遺鞠子羞」者也。《王制》注引《尚書傳》曰「年十五始入小學，十八入大學」，《內則》曰「十有三年，學樂誦詩舞勺，成童舞象」，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，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。穉子即育子。帝曰：「命女典樂，教育子。」西漢經師如夏侯、歐陽必有訓「育子」為「穉子」者，故史公以穉代育，蓋有所受之也。育、胄古聲相近（《大司樂》釋文育音胄，《邶風·谷風》篇「既生既育」，與恤、鱗、售、鞠、覆、毒為韻），作胄者假借字耳。《逸周書·大子晉》篇「人生而重丈夫，謂之胄子」，

<sup>93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 19 冊）卷七二二，總頁 13029。

<sup>94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 19 冊）卷七二〇，總頁 13012。

<sup>95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三，頁 75。

胄子成人，能治上官謂之士」，亦謂未冠者為胄子也。馬注曰：「胄，長也，教長天下之弟。」訓胄為長，始與史公異義。然云「教長天下之子弟」，則是以「教胄」二字連讀，而訓為教長，非以「胄子」二字連讀而訓為長子也。《史記》「教稚子」，集解引《尚書》鄭注曰「國子也」。《尚書·釋文》引王肅曰：「胄子，國子也。」則鄭、王皆以胄子二字連讀；然訓為國子，則不專指長子而言。……

《述聞》同卷尚有〈無遺育〉條，<sup>96</sup> 亦引有石臚此說相關之材料；其曰：

「我乃剝殄滅之，無遺育」，傳曰：「育，長也」（哀十一年《左傳》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，杜注亦曰「育，長也」），言當割絕滅之，無遺長其類。**引之謹案**：傳訓育為長，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，殆失之迂矣。今案：育，讀為胄，〈堯典〉「教胄子」，〈說文〉及《周官·大司樂》注並引作「教育子」，《周官·釋文》曰「育音胄」，是古育、胄同聲而通用。《說文》曰：「胄，允也。」無遺育即無遺胄。《周語》曰「晉懷公無胄」，是其證也。……

《述聞》此兩則論議，皆引用石臚所言而未稱「家大人曰」，反加「引之謹案」。考其中所論，蓋王念孫以為鄭、許所見當是古文經典作「教育子」，今本《尚書》作「教胄子」。而伯申則復加徵引，以論「育子」、「胄子」、「稚子」、「鞠子」之義；其結論謂「育、胄」古同聲通用，無所謂是與非也。故雖證據有與其父相同，而所判斷結論則異；宜其不稱「家大人曰」也。

第十九條	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〈曲禮〉：「客至於寢門，則主人請入為席」，鄭注云：「為猶敷也。」下文「然後出迎客，客固辭」，鄭注云：「讓先入。」正義云：「主人請入為席者，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。然後出迎客者，入鋪席竟，後更出迎客也。客固辭者，再辭不先入也。」謹按：〈聘禮〉：「君使卿歸饗餼於賓，賓迎於門外，及廟門，賓揖，俱入。」又：「賓見主國大夫，及廟門，大夫揖入。」皆無既入為席然後出迎客之事。**竊謂**「則主人請入為席，然後出迎客」當作一句讀，謂客至於寢門，則主人請先獨入敷席，然後出迎客也。此時主人實未入，故下云「客固辭，主人肅客而入」。謂客固辭主人之先入為席，於是主人乃肅客而入也。蓋主人嚮已正席，今客至門而又請先入為席，所以示慎也。客固辭者，辭主人之先入為席也，非辭己之先入也。禮入門亦無固辭之文。

李惇《群經識小》中有〈請入為席〉條，<sup>97</sup> 不稱「王懷祖曰」。而其內容收入石臚全部論議，並多附〈士相見禮〉一例，乃補充王念孫之論證，以更顯發其意；細觀原手稿中，本有「是敵體相見，初」數字，可以石臚尚欲有所辯析也。李惇所補例證，較之石臚者為優；蓋石臚所列舉者，其身份為「君」、「大夫」，其禮或與小民異，不如李惇所舉〈士相見禮〉為合適。然則李惇所補，蓋亦合於所用矣；是李惇於此條議論非徒鈔錄而已也。此條不見載錄於《經義述聞》

<sup>96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三，頁84。

<sup>97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《皇清經解》本，第19冊）卷七二二，總頁13028。

中，未知其故。

第二十條 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

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基，謀也。」注云：「見《詩》」，疏云：「基者，君子作事謀始也。」按：如此言則是君子作事當謀基始，非訓基為謀矣。考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引《詩》「夙夜其命宥密」，鄭注云：「《詩》讀其為基。基，謀也。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。」此即郭所謂「見《詩》」者，而邢疏未之考也。基或為謀，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：「回志竭來從元謀」，注：「謀，謀也。」

李惇《群經識小》中，凡手稿中論《爾雅》者，皆未採錄。

李宗焜書中於此條下曰：「參見《經義述聞》『惟、基，謀也』，第二十六卷6頁。」然細考之，除李氏所言「惟、基，謀也」條外，其實於《述聞》卷十九〈春秋傳下〉亦有相關之載錄，而李宗焜未之見。《經義述聞》「惟、基，謀也」條<sup>98</sup>下曰：

郭曰：「《國語》曰：『詢于八虞，咨于二虢，度于閔天，謀于南宮，護于蔡原，詰子辛尹。』通謀議耳；如、肇所未詳。（邵曰：如通作茹；《周頌·臣工》云「來咨來茹」，《邶風·柏舟》云「不可以茹」，鄭箋俱云「茹，度也」，度即為謀，故《釋言》又云「茹，度也」，《大雅·江漢》云「肇敏戎功」，毛傳「肇，謀也」），餘皆見《詩》。」引之謹案：郭言餘皆見《詩》，則「惟、基」亦見《詩》也。今案《大雅·生民》篇「載謀載惟」，鄭箋曰「惟，思也」，思與謀義相成，則惟亦謀也。蓋三家詩有訓惟為謀者，故郭云見《詩》。褚少孫續《史記·三王世家》曰：「維者，度也」，（惟、維古字通），度亦謀也。「載謀載惟」，猶言「是究是圖」，「弗慮弗圖」、「爰究爰度」、「來咨來茹」，「周爰咨諏」，「周爰咨謀」，「周爰咨度」，「周爰咨詢」，皆古人複語也。《爾雅》惟、圖、詢、度、咨、諏、究、如、慮，皆為訓為謀，則其義皆通矣。《康誥》曰：「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（十二字連讀）」，鄭注以基為謀（見《康誥》正義，某氏傳以「初基」為初造基，於基上加造字以釋之，非是）。《孔子閒居》引《詩》「夙夜其命宥密」，鄭注曰：「詩讀其為基；基，謀也；密，靜也；言君夙謀為政教以安民。」鄭訓基為謀，與毛傳異（毛傳：基，始也），蓋亦本三家也；故郭亦云見《詩》。基或通作基，定四年《左傳》「管蔡啟商，悉開王室」，謂謀開王室也，（說見《左傳》）。邵引《盤庚》「人惟求舊」，《周語》「后稷始基靖民」，皆失之，（「人惟求舊」，與「器非求舊」對文，則惟為語詞，猶《呂刑》言「非訖于富」也。《周語》曰：「后稷始基靖民。」，又曰「基福十五，基禍十五年」，三基字文義相承，則基非謀也）。

王引之於論述中不稱「家大人曰」而自稱「引之謹案」，或是以爲自得者夥也。考王念孫之言，主在論證「基，謀也」出於《詩》，以指邢疏之失；兼及「謀、基」相通。王引之則重在論「基」何以爲「謀」義，並兼及「謀（誓）、基、基」義本相通之理。王引之案語中未稱「家大人曰」者，蓋其論述之範圍更廣，其探義之功也亦深，時超乎其父所論多矣。其中唯論「基，謀也」

<sup>98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二六，頁620-1。

出於《詩》，則全取其父之意，其他多自有所得也。如所舉《康誥》「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」，鄭注以基為謀義，與《禮記》引《詩》鄭注之義，其詁訓相同；又復連類至《左傳》「**基聞王室**」，謂謀犯王室也。如此引類連通，視其父所得亦不遑多讓矣。

王念孫手稿中嘗提及「基或為謀」，而僅引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注「謀，謀也」為證，蓋亦倉促為之，未及詳論；此一論證乃唐李賢所注，其時去古已遠，不足據論。王引之於《述聞》卷十九，《春秋傳下》有〈基聞王室〉條，<sup>99</sup> 其中有為之補證。其論曰：

「管蔡啟商，基聞王室」，杜注曰：「基，毒也。管叔、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。」正義曰：「基，毒；間，亂。賈逵云然。是相傳訓也。」引之謹案：毒亂之語，不辭。**基之言基，基，謀也。**間，犯也。（說見前「以間先王」下）謂謀犯王室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「**基，謀也。**」《康誥》曰：「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。」鄭注以基為謀是也。《廣韻》：「基，教也；一曰謀也。」訓基為教，本于宣十二年傳「楚人基之脫扃」注：訓基為謀，疑即此傳舊注也。《玉篇》「**謀，謀也**」，《廣韻》「**基，謀也**」，**謀（基）、基、基**並字異而義同。

王引之力蒐諸詁訓資料，得《玉篇》之訓，比之《後漢書》注為優越。伯申實不忝稱「引之謹案」也。

今考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引《詩》「夙夜其命宥密」，鄭注曰：「詩讀其為基；基，謀也。」《尚書·康誥》曰：「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」，鄭注以基為謀，可證「基」有訓「謀」義也。然鄭玄之訓義未足以明《爾雅》「基，謀也」之必然。何則？《國語·周語》下引《詩·昊天有成命》，其言曰：

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成王不敢康，**夙夜基命宥密**。……夙夜，恭也；**基，始也**；命，信也；宥，寬也；密，寧也。其中也，恭儉信寬，帥歸於寧。

《周語》是先秦文獻，於此詩訓「基」為始；《毛傳》即用此義。鄭玄於《詩經》亦曰：「早夜始順天命，不敢懈倦。」然於《禮記》則訓基為謀，二者不同如此；說者多以三家《詩》說與《毛詩》異為言。而近年有上海博物館出版《上博二·民之父母》（與今之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內容相似），其中亦有引《詩》句「**迺夜晉命又誓**」<sup>100</sup>（即「夙夜基命宥密」）。其「誓」字從言几聲，即同誓、**謀**。《說文》：「誓，忌也。從言其聲。《周書》曰：『上不誓於凶德。』」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皆曰：「誓，謀也。」實可證鄭玄之訓義，其來亦有自矣，非憑虛造作者也；亦可證王引之所言「謀（誓）、基、基」並字異而義同，皆可訓「謀」也。

<sup>99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卷十九，頁477。

<sup>100</sup>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（二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16。

以上就王念孫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中所錄二十條經義論說，分析其內容涵意，對比相關資料，就中可得而論者實甚多，茲陳述如次：

- (1) 王石臞全函共錄論經義二十條，而復鈎乙剔除兩條，故石臞於信函之末云「倉卒錄得十八條」也。其所剔除者，〈《書·益稷》「笙鏞以閒」〉條，石臞自言因「犯某公諱」故也；至於〈《鄭·羔裘》首章「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」〉條則未知何以鈎除。今考得此說乃因出於其師戴東原，或以不敢掠美，故而鈎除之也。其中〈「今月令」者，非《呂氏春秋》〉條，於汪中《經義知新錄》中，亦有記載；<sup>101</sup> 可知石臞與同道間經常切磋討論也。
- (2) 王念孫生平之學書論著，如《讀書雜誌》、《廣雅疏證》，及其子引之所錄《經義述聞》等，皆未見有議論《論語》者，而手稿中有議論《論語》一條，彌足珍貴；可見石臞青壯之時，猶偶有致心力於《論語》校勘者焉。
- (3) 《群經識小》中錄有石臞函中論經義二十條中之十四條，較之石臞之子引之所錄《經義述聞》中所載尤多，以此可見王、李間學術切磋密邇，正如石臞所謂「有所疑則相問難，有所得則相告語」也。亦可據此知本信函手稿，確為寄付「李成裕惇」者也。
- (4) 李惇《群經識小》所未錄之六條，除出於戴東原條者外，餘皆為論《爾雅》及《論語》者，此當有可說者，其因如何，以俟來者。
- (5) 以阮元所刻《皇清經解》本《群經識小》與李紫培重刻其父李惇《群經識小》相對比，其書內容異者二：一為所有李氏原稱「王懷祖曰」之語，皆刪去之；其二為手稿第九條論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「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」十二字當作一句讀條，不見於李紫培重刻本中，而經解本則有之，作〈鄭氏誤讀〉條。其文句與手稿之原文相同，而與述聞同條之文句用修改後句稍異；可見阮元當曾見此手稿，而據之補入也。
- (6) 以李紫培重刻本《識小》觀之，李惇所稱引清朝學者之說，前輩有顧炎武、閻若璩，近之則戴東原，同時者除程易田一次，<sup>102</sup> 王念孫四次為最多。四次稱引皆在所錄石臞論說十四條中，可見李惇未有竊掩他人之說為己說之意。其未稱名引用者，或其說本亦非石臞所創，或為同道間共所討論而得，故而不歸美於一人也。《經義述聞》中稱名引述李惇之說者，亦止兩條：「子孫其逢」、「濟盈不濡軌」而已。想當時學術界間，於此自有度量準則。
- (7) 經查考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與《經義述聞》之關係，李宗焜謂述聞採錄手稿中止九條，而其實應有十二條，而見於十四處。其中論「詩經半句為韻」條，其例散見於《述聞》卷七〈詩經下〉〈古詩隨處有韻〉條中，此則陳鴻森先生以先言之矣。論〈「今月令」者，非《呂氏春秋》〉條，見於《述聞》第十四卷，〈《禮記》上〉〈固封疆〉條，且稱「家大人曰」。論〈《尚書》「教胥子」，許、鄭本作「教育子」〉條，見於《述聞》卷三〈教胥子〉、

<sup>101</sup> 汪中：《經義知新錄》，卷八〇一，頁4。

<sup>102</sup> 《群經識小》卷七，〈韜〉條下。此稱引程易田條，《經解》本與李紫培重刻本皆有之。

〈無遺育〉兩處。又手稿中論〈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基，謀也。」〉條，除李氏所言見於《經義述聞》第二十六卷『惟、基，謀也』條外，又見於《述聞》卷十九，《春秋傳下》〈碁閒王室〉條。

- (8) 以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手稿與《經義述聞》相同條項比較，十二條中，《述聞》所記稱引「家大人曰」者共十條；其不稱「家大人曰」者為第十八、第二十兩條。第十八條論《尚書》「育子」「胄子」，石臞唯言鄭、許本作「育子」，伯申則進而論「育、胄」音同相通，有進於乃父矣。第二十條論《爾雅》「基，謀也」，石臞證此訓見於《詩》，乃出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引詩鄭注；經義述聞則以伯申之名，進而論「基」何以可訓「謀」，並得「謀（誓）、碁、基」諸字形異而義同，皆可訓「謀」，其功夫較手稿所論，深探研鑽。可見王氏父子孜孜不輟，勇於精進之為學精神。

- (9) 對比《群經識小》與《經義述聞》所載同出石臞論經義函中條目者，可見王引之著錄《述聞》之時，必曾參校《群經識小》，故其中見解及文句，皆有相似之處。

### （三）王念孫對李惇《識小》抄錄經義雜錄函十四條之態度

李惇既收閱王石臞所寄付經義雜錄函，並以其中十四條納入其所著《群經識小》之中，似有竊掩人說之嫌。雖其中四條有稱名引用，蓋亦未全標示，其若可議之由猶在。然王念孫於此一事實，則既知之。

石臞於道光五年，曾為李紫培重刻其父李惇《群經識小》作序，是石臞必曾閱讀此書，則既知李惇採錄書函中十數條。然王念孫不以為意，並於序中陳言相交之厚，切磋之深曰：

余自壯年有志於鄭、許之學，攷文字，辨音聲，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。逡巡里下，同志者卒鮮，唯進士與余有聲氣之應；晨夕過從，無間風雨；市酒一桮，園蔬數器，抵掌而談，莫非古義；有所疑則相問難，有所得則相告語；聞者或訕笑之，而進士與余不殷之而少沮也。……今年進士子培紫取進士所撰付梓，而問敘於余。余與進士交最久，知進士最深。其學之顛末，非余執從而揚摧之，蓋進士好學深思，必求其是，不惑於晚近之說，而亦不株守前人。<sup>103</sup>

可見王念孫於李惇《群經識小》採錄已見，並無微詞。而石臞於序中，更條舉李惇學說之「不可拔」者十二條，今條列如下：

1.皋陶謨之「戛擊搏拊」，（卷二）	2.甘誓之「六卿」，（卷二）
3.洪範之「子孫其逢」，（卷二）	4.邶風之「濟盈不濡軌」，（卷八）
5.齊風之「展我甥兮」，（卷三）	6.周官之「諸侯封地」，（卷四）
7.考工記之「軹」，（卷八）	8.喪服之「出妻之子為」，（卷四）
9.檀弓之「期而後哭」，（卷四）	10.（檀弓）及「悼公之喪」，（卷四）
11.左氏傳僖十四年之「虢射」，（卷五）	12.定四年之「豫章」，（卷八）

<sup>103</sup> 李惇著：《群經識小》（續修四庫全書本，第173冊）書前附王念孫〈序〉。

此十二條中，除「子孫其逢」、「濟盈不濡軌」兩條，石臞曾明言為李惇創獲，並收入《經義述聞》中，其餘十條論說，均不與經義雜錄函中條目重疊。可見石臞既知《識小》中收錄已說，雖不以為意，然亦未嘗以己說歸美於好友如李惇者。若以此例推之於其子伯申，想亦如是。

考劉盼遂嘗編輯《高郵王氏父子年譜》，其中有整理王念孫所言，成〈高郵王氏治學切要語〉一篇，<sup>104</sup> 其中有文曰：

章學誠〈信摭〉一云：王懷祖御使嘗欲發明六書精義，有所會而無暇即筆於書。則曰：「願得其人，授之以意，俾筆為書，成即為其人著述，而不必著懷祖名。」以商於余。余曰：「創意難，屬辭亦復不易。果能懷懷祖氏意，而曲折以達於文辭，而不失其指，則其人亦不借懷祖氏以為重；即承其意而為書，亦不必沒懷祖名以見長矣。」章氏《遺書》九〈與邵二雲論學書〉略同。<sup>105</sup>

章學誠《章氏遺書》章九尚有〈與周永清論文〉書，<sup>106</sup> 亦有相同之論調，其言曰：

大抵論學論文之言，非出鄉氣稚氣，即是勦襲人言而文失其本旨者也。夫無者不可強而為有，猶有者不可誣以為無。足下自謂好名之心，不免倒行逆施。夫好名而能遂其名，雖倒行逆施可也；徒徒無益而反有所損，又以天質所良之業，不得專一其工，以致進退失據，豈不惜哉！足下曾記在京師日，有無識子駁永清志例，足下欲僕作書報之，僕終不作書，果何意邪？……夫人各有所能，有不能，雖堯舜之知，不遍物也。足下天質不能遠過中人，而學問文章則欲盡天下人知所長而皆有於己，即此已自無定識矣。而度力

<sup>104</sup> 劉盼遂編輯：《高郵王氏父子年譜》〈高郵王氏治學切要語〉，頁 62。

<sup>105</sup> 文中所云〈與邵二雲論學〉書，見《章氏遺書》（臺北：漢聲出版社，1973 年）章九，頁 184。其言曰：「聞足下之刻《爾雅正義》，劇有苦心，婉轉屈曲，避人先勦之於口說，而轉謂筆於書者反襲之於彼也。足下素慎於言，雅學又博奧而難竟，然猶燕談所及，多為拾牙慧者假借不歸，乃知風氣之儼（丁口弓）正，復何所不有！是知影止一而罔兩居二三也。鄙性淺率，生平所得，無不見於言談；至筆之於書，亦多新奇可喜。其間游士襲其談鋒，經生資為策括，足下亦既知之；斯其淺焉者也。近則遨遊南北，目見耳聞，自命專門著述者，率多陰用其言，陽更其貌；且有明翻其說，暗勦其意，幾於李義山之敝經，身無完膚；杜子美之殘膏，人多沾丐。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；言之可慚，亦可慨也。鄙昔著言公篇，久有謝名之意；良以立言垂後，無非欲世道之闡明；今既著有文辭，何必名出於我。後見王懷祖氏自言所得精義，不暇著書，欲求善屬辭者，承其指授而自著為書，不必人知所著，本於王氏。乃知王君與僕有同志也。然而有其志而不能遂其事者，則以承指授而屬辭，遂能達其心之曲折，千萬人中，不能得一二也。且使果具此才，亦可不藉榮於王氏矣。然則專心指授，猶不敢望人達其曲折，況勦襲言辭，安能不謬其初指乎？故學無心得而但襲人言，未有可恃者也。是以不得不別白而存其真也。顧寧人云：良工不示人以璞，恐其以未成之器誤人。我輩書未出而微言要旨，往往先見言論，遂使人得掩為似是之非，雖曰士風之澆而輕露其璞以誤人，我輩不得不職其咎矣。」

又考此條所言，王念孫欲於「六書」（應指說文之著作）。按王章濤著：《王念孫、王引之年譜》（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06 年），頁 47，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王念孫三十七歲，是年王念孫於京師為羅聘所繪《說文系統圖》題跋，與桂馥相討論之。是石臞有志於說文著作也。頁 48，據章學誠〈庚辛之間亡友列傳·陳以綱〉（見《章氏遺書》卷 19）中有云章學誠曾與王念孫共赴永清知縣周震榮之宴，相見甚歡。可知王念孫與章學誠確曾面晤談論。以此推知，章學誠所述王石臞之言可信。

<sup>106</sup> 章學誠著《章氏遺書》章九〈與周永清論文〉書，頁 194。

不能，往往出於術取計勦。天下豈無真耳目邪？王懷祖氏嘗言不暇著書，欲得能文之士，授以所學，俾自著為書，不必人知出於王氏。僕亦嘗欲倩人為《通義·外篇》，亦不願人知所授宗旨本之於僕，然竟不得其人。則學問中之曲折，非一時授受所能盡也。夫有心傳授，尚不能得其曲折，而賓筵燕談之間，行文流露之語，偶然得知，便可掩為己有，而人遂不能分別，有是理乎？僕嘗謂功力可假，性靈必不可假；性靈苟可以假，則古今無愚智之分矣。

章學誠與王念孫曾面晤，論及著書之事，二人頗有同感，皆以為研讀有所得，而往往無暇著作，故欲得能文善屬辭之士，授以所學，筆為著作，不必人知所著為出於王、章者也。

既然王石臞早有此意，故以一己研經所得，抄錄寄付李惇，使著於書，函中並懇勤囑咐，謂「此條須查《史記·宋世家》注補入」、「此條足下再增成之可也」等語，足見石臞本即欲予李惇增成其說，非徒相與討論者也。

石臞於學友，已然如此，然則於其子引之，更應有所期待。考其與章學誠會晤之後兩年，乾隆四十七年，王念孫年三十九歲，王引之年十七，補博士弟子員，從事文字、音韻、訓詁之學，甚得乃父稱許，以為「是可以傳吾學矣」。<sup>107</sup> 乾隆五十五年，石臞年四十七，王引之年二十五，自恃學識廣博，染自負高傲之氣；石臞遂命引之從陳昌齊游，與之共論《大戴禮記》，受益良多，為之折服。<sup>108</sup> 自是反躬勤懋，力學不懈。同年於京師撰成《周秦名字解詁》<sup>109</sup>，並擬草創《經義述聞》一書。<sup>110</sup>

王念孫既睹家有傳人，其學有成，指日可待，則彼與章學誠所言之事，可不必外求矣。今由石臞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中所論條項，與《經義述聞》比觀之，屢屢可見「家大人曰」之下，往往有「引之謹案」，其論頗有更進精研之者，雖所創獲本之石臞，而引之繼志之功，亦不可盡泯也。

以上所述總而論之，石臞以己之所獲，囑其子再深入探研，合父子之力，求得經義之正，校勘古籍之誤，誠學術壇席之佳話。此與或謂「竊奪掩有」，與夫「託名歸美」之事，實不可一概而論，同日而語也。

#### （四）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寫錄時間及原因

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中，並未明示寫錄時間，歷來文獻之中，亦無從稽考。然就李惇《群經識小》載錄手稿中十四條，或可推論寫錄時間。

據王念孫所作《群經識小》序曰：

<sup>107</sup> 湯金鉞：〈伯申王公墓志銘〉（《羅雪堂先生全集》六編第19冊），《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》卷一，總頁7453。

<sup>108</sup> 曾釗著：《面城樓集鈔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，冊1521）卷四，〈陳觀樓先生傳〉末「曾釗曰」，頁557。

<sup>109</sup> 王壽昌等撰：〈伯申府君行狀〉（《羅雪堂先生全集》六編第19冊），《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》卷五，頁7580。

<sup>110</sup> 王引之著：《經義述聞》，見卷首〈自敘〉。



歲在丙申（乾隆四十一年，1776），余乞假歸，進士始哀集說經之文，顏以《群經識小》。又九年而進士沒；兒子引之撰《經義述聞》，載進士經說二條：一為「子孫其逢」，一為「濟盈不濡軌」；皆至當不易之論，可謂獨有千古矣。

王念孫撰序之時，在道光六年（1826）八月，時年八十有三。李紫培為乃父重刻《群經識小》，則在道光五年；而李惇手定之《群經識小》，則作於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。而李惇卒於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年五十一；則經義雜錄書至遲當在乾隆五十年之前寫錄。復考李紫培重刻《群經識小》凡例云：

一先君子詩、古文辭各擅其長，隨時應接，不加編集，惟耽嗜經學。生平所著凡數十種，每好與海內同志參得失，四方從學者眾；攜去者未及徵回，故家無定本。是集惟據存稿五卷，暨〈附錄〉二卷、〈補遺〉一卷，共成八卷。

一是集首五卷，係乾隆丙申（四十一，1776）歲先君子手訂說經之初本，自署曰《群經識小》，今仍其名。

是李紫培重刻本《識小》中，前五卷即仍係李惇當初手定之說經內容。今考《識小》所錄王念孫經義雜錄書中論經條項，皆在前五卷之中。由是觀之，《識小》錄入此十四條經義，必為李惇手定，其時間必在乾隆四十一年之前。若不知《群經識小》與手稿之關係，則手稿寫錄時間，不可得而之矣。

前述王念孫《識小》序中嘗云：「歲在丙申（乾隆四十一年，1776），余乞假歸，進士始哀集說經之文，顏以《群經識小》。」李惇研讀群經，探求經義，續有所得，當在此年之前，積有年所矣。至乾隆四十一年，適石臞歸鄉，遂相與討論切磋，哀集說經之文，以成著述。

考王念孫學友賈田祖有〈丙申孟冬同李成裕惇過王懷祖庶常湖西別業，時懷祖正注許氏《說文》，奉贈三首〉詩，<sup>111</sup> 其三有句云：「李君篤學人，為老稱典型。」即詠李惇者也。而王念孫經義雜錄書寄付李惇，書末有言曰：「倉卒錄得十八條，本欲再謄清稿呈閱，恐再遲則緩不及事，且案頭無書，不能考證，祇據意見所到為之，故多所未安，務祈考訂原書，重加改正。」可見石臞之意，本即為李惇雜錄經義，俾其考證、改訂，以成定說者也。所謂「恐再遲則緩不及事」之語，其中之「事」，或即指李惇「哀集經義之文」以成《群經識小》一事而言也。

然則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，當寫錄於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前後，其寫錄目的，即在供李惇據以立論，考訂文義，以成經說，錄入《群經識小》者也。

<sup>111</sup> 賈田祖著：《容瓠軒詩鈔》，卷四。

## 五、結語

翁覃溪曾作對聯頌王石臞曰：「識過鉉錯兩徐而上；學居先後二鄭之間。」<sup>112</sup> 王念孫之同鄉學友賈田祖，嘗爲詩以描述石臞云：

君志不在隱，所志在著書。著名匪愛名，迷津導群愚。粵稽文字興，蟲鳥出皇初。史籀十五繼，炳煥昭寰區。秦人創隸法，形模稍已殊。爾後日變亂，古制彌淆渝。東京許叔重，隻手爲匡扶。其文萬有餘，音義垂典謨。世久復破壞，紹述起二徐。掇拾豈不勤，不能掩瑕瑜。歷今又千載，踵陋承其誣。君通六書祕，翻覆生嗟吁。澄心究本始，雅訓刊粗疏。十年擢謂賢，一字百踟躕。由周迄漢唐，發篋勤爬梳。匪直許氏文，星日麗天衢。其言關聖作，卓哉軒蒼徒。嗤彼辭章流，仰屋何爲乎！<sup>113</sup>

可見石臞於青壯之時，即已究心經典、文字、雅訓古學。及後石臞研學既勤，年壽又高，積學深思，故其學術所得，實較同儕爲多。然吾人所見王氏學術成就，全匯凝於所著《廣雅疏證》、《讀書雜誌》、《經義述聞》諸書之中，至於其成學之過程，則莫之能睹。

前所論述，就中研院史語所所藏王念孫經義雜錄書手稿，深入研究，可知乃抄錄經義，以付李惇，爲李氏哀集經義論述，用成著述《群經識小》者。手稿中總錄經義二十條，可觀察石臞青壯時學術研究之軌跡；並據手稿與李惇《識小》所錄對比分析，以見彼與學友交流之情狀。不私己所得，往往相與研討，交流新得。持手稿與《識小》、《述聞》相互比較，可知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之作，不獨得於庭訓，間入己見，尙有取於《群經識小》。尤有進者，可據以見王引之傳承乃父之學，父子合璧，成就非凡，誠學林之美談也。

本論文對王石臞經義雜錄手稿之研究，或有一二新見，與前輩不同，可供參考：其一、以爲手稿當更題爲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；其二、手稿共錄經義二十條，而石臞刪去其二，故數「十八條」；其三、手稿寫錄時間當在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前後，而寫錄之目的在供李惇參考、修訂，納入所作《群經識小》中；其四、以石臞此〈經義雜錄付李惇書〉，與《群經識小》、《經義述聞》相對觀，以論王念孫之學術傳承觀，王念孫與友人學術交往之情狀，王氏父子間學術之關係，據論李惇、王引之之於石臞學說，既非「竊奪掩有」，亦無「託名歸美」之事，實爲石臞欲將一己研經所見，溥賦成學之士，使能考訂足成，凝練真義實學而已。此無私之忱，學術良心，誠可質諸古人與來者也。

<sup>112</sup> 王引之撰：〈石臞府君行狀〉（《羅雪堂先生全集》六編 19 冊），《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》卷四，頁 7515。

<sup>113</sup> 賈田祖著：《容瓠軒詩鈔》卷四。〈過王懷祖庶常湖西別業，時懷祖正注許氏《說文》，奉贈三首〉之二。時乾隆四十一年，王念孫三十三歲。